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原日租界中街89号），这里曾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同时也是我党重要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秘密办公地。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动员民众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

（图、文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提供）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邈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游 迎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 4 定格历史记忆的红色摄影师
——童小鹏与武汉八办的照片之缘 / 王 莹

文化传承

<<< <

- 7 我的 70 年剪纸之路 / 刘士标（口述） 赵亚琪（整理）

商聚汉皋

<<< <

- 12 时代浪尖的弄潮儿 / 胡华锋
16 化作春泥更护花 / 马红军

精工匠心

<<< <

- 20 当好武汉地铁“最强站长”
/ 姚 婕（口述） 白爱萍（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340 期)

委员天地

<<< <

25 为初心 做匠人 / 徐击水

31 我的抗疫故事 / 邝远平

往事漫忆

<<< <

35 我在水生所做研究 / 刘仁俊

38 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 吴至诚

42 我和我的钢琴博物馆 / 贺立军

都市史话

<<< <

45 回望武汉治政史上名芳千古者 / 郑巍宁

49 武昌后长街往事 / 陈德刚

56 汉阳古城旧事 / 胡德彰

文史随笔

<<< <

60 穿透浓雾向阳开 / 李宗祥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定格历史记忆的红色摄影师 ——童小鹏与武汉八办的照片之缘

◇ 王莹

2012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有幸成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八办）旧址纪念馆的一员。转眼间，我在纪念馆工作已有9个年头了，如今主要负责陈列设计和资料保管。我馆现存的馆藏老照片有2000余张，每次设计新的陈列展览时，我都会反复查阅、考证、编辑。在我看来，这些极具历史沧桑感和真实感的老照片是蕴涵了深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比起单纯的文字史料，它们在陈列展览中更能直接地表现出那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历史。而我在每一次深入挖掘和研究这些老照片的过程中都能有所收获：每一张老照片的背后都有着值得去探寻的故事，照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抗战时期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缩影，照片中所定格画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每每感叹这些照片弥足珍贵的同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人，并肃然起敬：他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

许多只有他才有机会捕捉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共领袖人物的历史瞬间，并赠予我馆100余张他亲手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他，就是我党重要历史的见证人——童小鹏。

伴随伟人 投身革命

童小鹏捐赠我馆的照片不仅数量多，而且与我馆抗战史研究联系最为密切。照片中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八办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武汉1938年的抗战历史。刚开始我很好奇，为什么童小鹏有机会拍摄到那么多珍贵的伟人画面呢？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这和他的革命经历是分不开的。

童小鹏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入伍后曾在红四军、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

局任秘书,从事文字工作。1933年5月24日,童小鹏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只有35岁,双眉浓重乌黑,目光炯炯有神,特别是粗黑的胡须,使人不禁想起“胡公”的美誉。那天,周恩来在全军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给童小鹏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周恩来总政委的报告是“极为周密详细”,这也是对周恩来讲究风格、办事作风的极好概括。西安事变爆发后,童小鹏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随员,与周恩来一同到了西安,亲历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目睹了周恩来在重大历史关头纵横捭阖、力负重任。此后,童小鹏便跟随周恩来奔走于南京、武汉、重庆、延安等地,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南方局机要科长等职。这些经历让他见证了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抵达延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重庆谈判、叶挺出狱等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主要参会领导的合影照片也出自童小鹏之手。这些照片历经战乱以及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可谓弥足珍贵,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军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童小鹏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

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之久。经过长期的交往,他认为:“周总理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很丰富,实际上就是一部高深的党史。”

重返八办 谆谆教诲

如果说是武汉八办馆藏的老照片让我认识了童小鹏这位红色摄影师,那么我馆档案室里珍藏的另一张照片则让我有幸目睹了这位老革命家的风采。那张照片是童小鹏1999年重返武汉八办纪念馆时拍摄的,照片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精神矍铄,笔挺地站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大门口,目光恬静而坚毅。为了了解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询问了当年多名在场接待童小鹏的老同志,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身临其境般了解了当天的情景。

1999年5月28日,85岁高龄的童小鹏又一次来到他61年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上午9点,童老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进纪念馆,与早已



1999年5月,童小鹏(前)参观《武汉抗战陈列》展览

等候在门口的时任武汉市文物办主任郑自来及纪念馆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据工作人员回忆，童老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笑起来更是爽朗豪气，陪同他前来参观的有他的儿子以及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60多年后故地重游，童老非常激动，他顾不上休息，就沿着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二楼右边的一个房间（现讲解员办公室），他指着该房间对工作人员说：“我当时就住这间。”看见三楼的厕所，他摇摇头说：“当时这里不是厕所，是李克农的房间。”来到四楼机要科，他认真看着墙上他和其他机要科工作人员1938年的合影，久久不愿离去。柳仁甫、肖贤发、王选文、张海生、赖平、王清生，黑白照片中一张张熟悉而充满朝气的脸庞，把童老的思绪又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年，童小鹏任机要科长，他和照片上的同志一起不顾敌机的轰炸，坚守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解放后，这些同志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奉献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王清生在总参通讯兵部工作，肖贤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柳仁甫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培养接班人……如今，有些同志已不在人世，想到这些，童老不禁感慨万千。接着，童老登上景色怡人的屋顶花园，在这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曾接待过吴德施、史沫特莱、戴维斯、卡尔逊、史迪威等国际友人及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人员。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后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欢迎，并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笑靥。童老对屋顶花园有着特别的感情，爱好摄影的他曾在这里拍下不少八办工作人员的照片，每次到八办，他都要上来看。这次他又来到屋顶花园，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在参观《武汉抗战陈列》（现《大武汉1938》历史陈列）时，

童老指着周恩来、秦邦宪与吴德施在屋顶花园的合影，叶剑英和李克农在八办代表八路军接受美国华侨捐献的救护车，孩子剧团在屋顶花园的合影等老照片，自豪地说：“这些是我拍的。”童老曾赠送八办纪念馆由他拍摄的历史照片100多张。这些照片多次用于展览，是真实反映历史、教育后人的珍贵历史资料。他再三强调要将照片都展出来，不要锁在柜子里，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这段历史。参观完旧址后，童老在接待室休息，并与八办工作人员进行了交心谈心，他谆谆教导工作人员：“你们要客观公正地反映长江局，长江局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他还认真翻阅了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和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共同编辑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一书。临别前，他告诫八办纪念馆领导：“做好革命传统教育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并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六十一年后又回老家”，表达了对八办的深厚感情及对纪念馆工作寄予的厚望。

正如纪录片《红色人生——童小鹏传奇》所评价的：童小鹏的照片以一个人的摄影，成就了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重要的影像历史。虽然童老在武汉八办纪念馆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但他所拍摄的一幅幅照片定格的历史瞬间却是永恒的，它们将永远挂在纪念馆的展厅内，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不忘中华民族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的艰难历程，厚植深深的爱国情怀。童老临行前的殷殷嘱托和深切期许也将永远激励着武汉八办纪念馆全体工作人员牢记责任和使命、弘扬先烈精神。

（王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员）

我的 70 年剪纸之路

◇ 刘士标（口述） 赵亚琪（整理）

剪纸最早出现在北朝时期，至今已有 1500 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剪纸艺术已经初具雏形。到隋唐时期，剪纸艺术日趋繁荣，“剪采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一把剪刀，几张纸片，一场剪刀与纸的纵横捭阖即将上演，花鸟鱼虫不在话下。经过千年的风吹、千年的日晒、千年的打磨，剪纸艺术如今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别具匠心地展现出社会的繁荣发展和文化风貌。

剪纸之道，纵横南北，地域差异，确实显著。剪纸艺术发展到今天，具体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细腻秀美，北派粗犷豪放。北派剪纸多用剪刀剪制。而刻的方法是用特制的刻刀雕刻，又称刻纸，作品风格严谨、细腻，装饰性强，南派剪纸多用这种方法创

作。从表现技法上讲，又分为阳剪、阴剪。阳剪讲究“线线相连”，阴剪强调“线线相断”，阳剪、阴剪是相对相生的。而我致力一生的剪纸艺术，则是结合南、北两派之长，融通其意，剪刻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汉派剪纸之风范。汉派剪纸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城的人文历史和文化风貌。

与民间工艺剪纸结缘

“月是故乡明”，我的故乡在有“小汉口”之称的湖北监利，那里是激发我体内艺术萌芽的源头。监利市的朱河镇民间艺术发达，手艺人层出不穷，个个技艺精湛，他们制造出来的民俗工艺品传承着中华民间文化，源远流长，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民

间艺术的兴趣。我出生于中医世家，两个邻居一个是做类似于龙、蚌河精扎纸的，另一个是做唱戏的帽子、刀具、衣服的，就是戏魁。我打小就对这些着迷，街头巷尾的民间艺术，邻居之间的点滴熏陶，让我每天放学最大的念想就是走进纸扎铺、戏帽馆去看一看、瞧一瞧，看他们制作出一些东西。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想学他们剪纸，简直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剪了一段时间后，邻居就不让我去学了，怕我把手艺学走了，他也要吃饭呀。年仅8岁的我，为了学这门剪纸手艺，也是费尽了心思。我到处去捡烟头，剥开外面的一层烟纸，换成家里的新纸，包裹成烟卷送给邻居抽。每当邻居家需要人的时候，我都招呼一帮小伙伴们迅速赶去帮忙，这一来二去，和邻居们也就算打了个熟识，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不排斥我学他们的手艺了。在纸扎店和古装戏服店窜来窜去的这段经历到现在我仍记忆深刻，去邻居家闷着头看，然后

回家拿着废弃的烟纸壳、废旧的盒子剪出蝴蝶、龙等图案，学了不少花样。我就这样偷师学会了剪纸，入门越久，兴趣越浓，由此开启了我与剪纸一生交错的生涯。

走上工业剪纸之路

跟随着老师傅一直学到1950年，那一年我10岁。只记得转过一年，家乡发了大水，我们的家被淹了，我跟着父亲到处逃荒，到了长沙，就靠剪纸赚些盘缠以供生存。1953年回到家乡监利，我又重新有了剪纸的机会，到镇上参加美术比赛，剪鱼、剪花鞋，以模仿为主，也是颇有意思。

1956年，我被招进了武钢，读武钢技校电工专业，迁到武汉市青山区居住。学习、工作之余，剪纸也一直是我的事业。别人都不太瞧得起，觉得剪纸没什么用。我剪出的那些龙飞凤舞、鞋花、枕花、窗花，充满着乡土气息，到城市以后都不太被接受，

和大城市的光环格格不入。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剪纸，可能注定会被时代淘汰。因此，我开始有了另一个大胆的想法，如何将武钢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剪出来呢？“形成一种新的剪纸模式，将剪纸带出‘婉约派’，走向‘豪放派’。”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尝试剪工厂黑板报上的天安门、镰刀、斧头等图案。后来布置车间，我剪的图案派上了大用场，一下我就成了车间里的名人。被更多人喜欢，让我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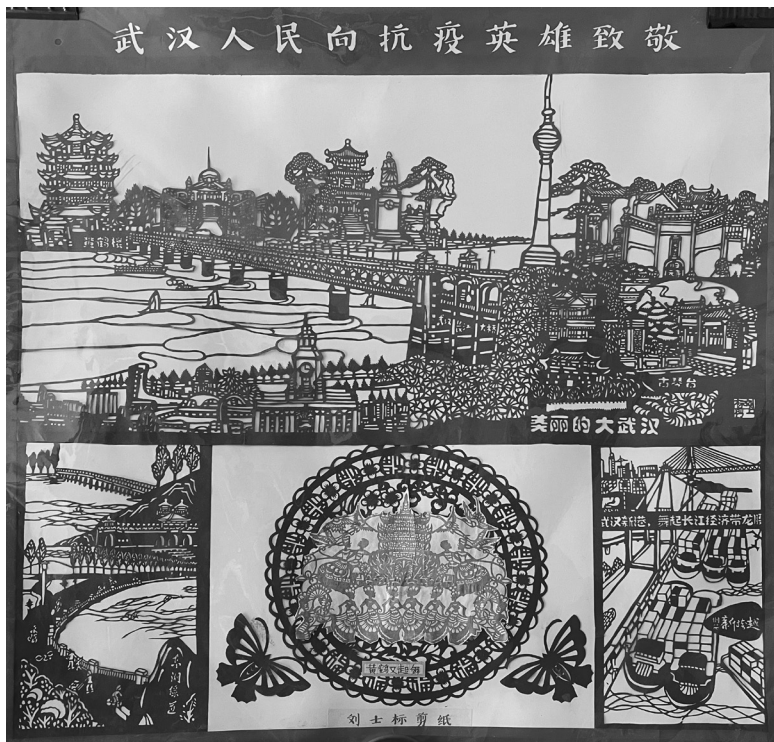


2020年11月，刘士标讲授雕刻技巧

干劲儿，从此，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剪纸上。为了剪出武钢的一片欣荣气象，我白天背着馒头、开水下到工矿厂区去采风体验，访问那些操作工、炼钢工，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辛苦，争取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在作品中呈现出来。于是，武钢的铁水、钢水、火车皮、高炉、钢包都开始进入了我的创作视野，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紧锣密鼓的准备，奇思妙想的结合，工业剪纸之路由此开启。我突破原有剪纸样式和模式，由最初剪纸只能剪出鞋花、枕花和窗花，到如今可以反映劳动人民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除此之外，我还引入了北派剪纸的剪刀技法，将各种线条进行组合，同时还汲取了版画、国画的特点，采用套色和染色，让剪纸兼有柔细和粗犷的风格。如《抢修》这幅脱手剪纸作品，表现了两个工人正在进行紧张抢修的情景，场面既紧张又轻松，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传统的汉派剪纸，实质上是用刀刻，多为曲线，我引入的北派剪刀技法，用直线、粗线表示高炉，使其更为宏伟壮观；用曲线、细线表示烟雾，使其更为生动自然；用斜线来表示奔腾的钢水，使其更为欢快流畅。事实证明，我的这些做法，将剪纸艺术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引起了较大反响。

毕业后，我本来在工会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举办了一次大型美术展，各类美术作品争相大放异彩，但美展中剪纸作品却凤毛麟角，在不显眼的展厅孤零零



2020年，刘士标创作剪纸作品向抗疫英雄致敬

的。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开创工业剪纸，让这朵崭新的艺术之花绚烂在民族艺术之林。

后来，武钢组建了画院，邀请我担任院长，这为我的剪纸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平台。1984年8月，我受邀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第六届美展，深受鼓舞。其后，我受邀组织的武钢职工剪纸艺术作品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举行。我的《洪流滚滚》《沸腾的武钢》《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一系列作品和62位艺人的作品一起登上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时任冶金部部长李东冶主持了开幕式，王任重、张平化等中央领导出席并给予了高度赞扬。在这次盛会中，我和我的同事们运用剪纸艺术反映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纷纷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动力。

经过多年的磨练与努力，1989年，我组织举办了“中国（武钢）、日本、美国剪纸联展”。鉴于我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作工作上的成就，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我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1997年，我的作品《迎

香港回归》获冶金部美展大赛大奖。1999年，我的作品《钢花系列》在中国民协、中国剪纸协会举办的建国50周年展览会上获得金奖。2007年，在我参与组织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国风归来”——第二届全国剪纸艺术展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的剪纸作品《回娘家》参展。2011年，我被湖北省推荐为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至此，工业剪纸艺术在我手上生长发芽，更加生动鲜明地向世人展现着艺术来源于生活。突破虽不易，但是却至关重要，一切文明，不能适应当下时代，则将无法传诸后世。

悉心传承古老工艺

我一直致力于将工业剪纸艺术打造成为家乡武汉的名片、中国的名片。武汉是“白云黄鹤之乡”、辛亥首义之都、明清四大名镇之一，如今大跨步走向新的发展历程，城市文明建设也仍旧是武汉的灵魂和核心。



2017年，刘士标（左）指导毛明月创作剪纸作品

汉派剪纸艺术在我手中发展和传承，和武钢之于我、以及武钢之于武汉的意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这一生的坚守，不仅是为了我自己热爱的事业，还想为武汉留下最朴素的武钢盛景略尽绵薄之力。

自20世纪50年代武钢建立以来，一直秉承“务实创新，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武钢人一脉相承的“严格、认真、忠诚、奉献”的精神，融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城市精神，成为武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岁月悠悠，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武汉正以全新的面貌向世界展示着一座老城的光荣和巨变。而我的工业剪纸，是传统剪纸工艺与工业钢铁文化的撞击，是武汉光辉岁月的参与者、见证者。“日暮乡关何处是？”黄鹤楼是我剪下的乡愁，鹦鹉洲是我终身的守候。在青山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的剪纸事业逐渐形成气候。

2014年，青山区委、区政府将位于红钢城街和畅社区的青山区民间艺术传习中心的三楼无偿提供给我，开办个人剪纸艺术

博物馆，300平方米的空间容纳了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初具规模后，经过区政府批准，我开始收徒弟，一共收了5个徒弟，还带了一个老年班，这一带就是十几年。我收徒弟有一个喜好，特别喜欢招收家庭贫困、或者是身体有残疾的徒弟。我也是从生活的困苦里熬过来的人，深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艰辛和不易，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可以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能够传承剪纸工艺，也可以具备一项谋生的技能。我的大徒弟毛明月，身患小儿麻痹症，双腿重度残疾，多年来勤学苦练，终于学有所成。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汉时，他有幸将自己的剪纸作品《青山新江滩》送给总书记，还向总书记介绍了剪纸工艺传承情况。

国家培养了我，我也希望能为社会奉献一点力量，除我的徒弟小毛以外，还有残疾青年葛海和智障青年小赵，他们都是我的爱徒，也都在剪纸上小有所成，并开始做民间传统工艺的传承工作。总书记希望我们的剪纸工艺后继有人，并殷切嘱咐我们做好非遗传承工作，打造一张独特的中国名片、武汉名片，而他们就是传承剪纸工艺最好的载体！

从我个人层面来讲，随着年岁渐高，我更加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我现在的工作是要把家里的好东西尽快整理出来，将那些能够展示当代文化风貌、历史沿革的作品，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年武钢热火朝天生产场景的作品等整理归档交给国家，把它们保存下来，一代又一代形成史料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欣赏，这也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

工业剪纸是我开创的具有武汉特色的剪纸艺术，兼容南、北两派剪纸的特点，形

成刻、剪结合的模式。我深知，武钢在发展，武汉也在发展，非遗的传承工作离不开创新，剪纸的技法可以长存，但是剪出来的内容要和时代、城市同呼吸、共命运，这项技能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70余年的奋斗，我的艺术之路虽然尝遍酸甜苦辣，但是欣逢盛世，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创作的万余件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进千家万户。小小斗室，大大价值，见证了武钢的辉煌、武汉的发展。看到我的徒弟们日渐出师，艺术生涯渐入佳境，我无比自豪。我们是新中国培养并在江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与见证人。

我与剪纸情谊深长，与武汉共赴荣光，希望在未来，传承、创新可以让汉派剪纸真正成为武汉一张靓丽的名片。

（刘士标：武汉剪纸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亚琪：江汉大学湖北省非遗研究中心研究生）

时代浪尖的弄潮儿

◇ 胡华锋

1996年，我来汉做起了纺织业。二十余载纵横商场，我站在时代浪尖，犹如一个弄潮儿，抓住机遇，凭着一股子敢闯敢干的冲劲，赢得了一番天地——不仅成为武汉商贸行业的佼佼者，还涉足建筑领域，开始多元化经营之路，用青春和拼搏书写自己的创业历程。

抢抓先机 入汉经商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暖流的滋润下，中国迎来个体经济发展的大潮，无数创业者陆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其中也包括我。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父母就追随改革开放的脚步，率先下海经商，创办了一家纺织品厂。父辈创业的奋斗精神深深地感染、熏陶着我，成年后，我决心离开父母的羽翼，出去闯一闯。

当时，武汉的汉正街被誉为“天下第一街”，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小商品批发市

场、商贾云集之地，更是创业者、淘金者的天堂。怀着内心的向往，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虽然时隔二十余年，但当时的情景我却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开店的事，到了武汉之后，顾不上精挑细选，租了个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住下。落脚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张罗大大小小的事宜：租门面、找仓库……一路上全靠两只脚行走。一番折腾下来，丝绸批发店总算顺利开业了。虽然门面是合租的，仓库也不大，但我却心满意足，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杭州的丝绸闻名全国，产销一条龙，所以我在汉正街的丝绸生意做得很火热，既不愁货源，也不愁销路。我从杭州自家的纺织厂提货，再通过门店将其推销出去，形成了一条集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那时候生意好，我从早忙到晚，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天，我都是披星戴月地出货进货，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凭借诚信经营和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丝绸店赢得了客户的良好口碑，我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生意越做越大。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和沉淀积累，2000年，我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规模，成立了商行。

融入大潮 求思谋变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传统的经营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我意识到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开展产业化经营。

但是，我的想法和决定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家人认为传统的经营模式更成熟，转型升级成立商贸公司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只好不厌其烦地向家人解释，引导他们转变观念，最终家人们都被我执着的精神所感染，全力支持我改革。

2012年，我整合资源成立了武汉市君子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主营纺织品、床上用品、电热毯等，致力于将其打造成集制造配套、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企业。在我的带动下，公司经营的版图不断延伸，积极进军商超行业，先后与中百仓储、武商量贩、家乐福、大润发、北京华联等大型知名超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员工也增至300余人。

为了更好地扎根湖北，我又在湖北省各市、县设立了特约经销商。在我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分公司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与此同时，

通过不断克服艰难险阻，我们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销售团队，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销售网络，在全国各大省、市设立代理，为公司走向全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深知员工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带领员工实现企业发展的宏伟目标，使公司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趋势，我不遗余力地培养身边的员工，为他们列出学习的书目，带领他们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与他们共同进步。在我的带领下，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爱学习、勤学习的良好氛围。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我也经常与员工沟通，深入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难处，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在这种温暖、和谐的工作环境中，所有员工都干劲十足、斗志昂扬，为了公司的美好未来而竭尽全力。在公司管理制度上，我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机制，使得管理方式不断趋于科学、规范。良好的管理模式在公司的经营中取得显著效果，公司业绩年年见长。

然而，眼前的成绩并没有让我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激起了我干事创业的热情。我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业规划，加快创业步



2019年4月29日，硚口区委、区政府召开招商引资暨创优营商环境大会，胡华锋（右二）受聘为硚口发展顾问

伐,将经营的触角延伸到建筑领域。2016年,我和几个合伙人出资成立了湖北浙杭泽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成立了湖北杭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历程。

互帮互助 抱团取暖

商场驰骋二十余载,我的目标不仅是做好公司,积累财富,只为赚钱而赚钱,我更渴望将公司打造成一个服务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也让公司根植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这是我来武汉二十多年最大的体会。创业之初,我遇到过许多困难,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这些事、这些人至今令我记忆深刻。

有一次去进货,在回来的途中货车坏了,我心急如焚,只好去附近的村子里找人帮忙。村里的小伙子们一听,二话没说,回家拿了工具就帮我修好了。我想拿出一部分酬劳分给小伙子们,却没有一个人肯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此后我经常参与一些小型公益活动中,哪怕是在路上遇到了流浪者,我也尽可能地去帮助。

2004年,我的儿子出生了,一家人沉浸在喜悦的氛围里。可是在妻子生产后的第三天,我却不小心骨折了,夫妻双双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时,我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公司里有忙不完的事务,我心里很是发愁。朋友得知此事后,主动请缨帮忙,才使我熬过了那段日子。

是朋友们的帮助让我一次次渡过了难关,所以当昔日的合作伙伴在工作中出现了

资金问题时,我也毫不迟疑,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主动把货发给别人,帮助其渡过难关。

在生活中,朋友很重要;在市场上,合作伙伴同样重要。当今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大,我明白单打独斗是难以走出困境的,要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突破重围,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还要学会合作互助,抱团取暖。

为了把在鄂杭商凝聚到一起,2014年,我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发起筹建武汉市杭州商会。在筹办商会的过程中,我不仅得到了两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很多企业家的支持,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我希望为浙江杭州与湖北武汉两地政府、企业家搭建一个桥梁,把武汉市杭州商会打造成整合资源、分享资源、为企业排忧解难的服务平台,让在鄂杭州籍企业家把商会当成他们的娘家。

如今,商会连续三年被评为武汉市“四好”商会。往后,我们商会也会秉承初心,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为会内企业解决难题,维护他们的权益。

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到今天成为一个有所成绩的企业家,我始终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干事创业的初衷和理念——坚韧不拔的精神、大智大勇的风采、热心助人的情怀。我相信,有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在鄂乡贤的大力支持,武汉市君子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必然会成长为一个享誉湖北乃至全国的优秀企业,武汉市杭州商会也必然会成长为一个在湖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会。

同心抗疫 共克时艰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和商会理事兼秘书、雪域华国堂(武汉)保

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国联系对接三亚、北京、广东等地爱心企业和部门团体，捐赠爱心蔬果。

记得1月26日，武汉封城后的第三天，当时已回杭州老家、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时刻关注疫情动态和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最新决策部署，多渠道呼吁动员，第一时间与海南、广东、北京等地的爱心企业和部门团体对

接，向湖北抗疫前线捐赠蔬菜瓜果，支援湖北抗疫。1月28日早上，第一批捐赠的20吨爱心蔬菜从海南三亚驰援武汉同济医院。在得到爱心企业家的响应后，我迅速组建结对抗疫服务群，公开透明、定向链接武汉、黄冈、孝感、随州、咸宁的政府机关、卫健委、防疫指挥部和各大医院及浙江医疗队，详细了解需求情况，办理接收证明和卸货后司机车辆返程证明，协调接收和分发事宜，监督捐赠果蔬发放到位。由于接收单位多，涉及面广，我从早忙到晚，不停地打电话发微信，好几次早上打开手机就一连几十个电话，顾不上洗脸，躺在床上对接协调，三顿饭凑一顿吃。有一次，对接完当天最后一批芒果，一天打了整整70个电话，从上午10点打到晚上10点。

由于运输费用贵，车辆难找，前方又急需物资，后改为火车运输。满载152吨蔬菜瓜果的首趟爱心冷链专列于2月20日下午5点从三亚出发，23日下午到达汉口舵落口货站，当晚组织硚口区各街道等接收单位用卡车分配转运完毕。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捐赠方说有群众反映，捐赠给武汉的78吨哈密瓜放在超市售卖。接到电话后，我在



2020年12月，胡华锋（右）到武汉头等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武汉市硚口区、江岸区和武昌区相关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从瓜果分发计划、签收单和电话排查入手，立即展开了调查核实。核查结果证明，定向捐赠的78吨哈密瓜已全部分发到了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手中，不存在超市售卖情况，并在今日头条发布了核查通报，给爱心捐赠人士吃上了定心丸。截至3月23日，通过我的联系对接，给湖北武汉、黄冈、孝感的80多家医院，北京、上海、辽宁、重庆、浙江等33个省、市、区和部队援汉医疗队，武汉市江岸区、硚口区，孝感应城市、大悟县等21个市、县、区的一线医护、环卫、社区工作人员共捐赠蔬菜瓜果935.5吨，其中蔬菜415.5吨，瓜果520吨，草莓620斤，受助覆盖达7.5万多人次。

因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突出表现和责任担当，我被武汉市授予抗疫先进个人称号。

（胡华锋：武汉市君子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杭州商会会长）

化作春泥更护花

◇ 马红军

2000年年初，我还是刚刚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不谙世事的我跟随老乡来到武汉。看到车辆川流不息、高楼鳞次栉比的大武汉，我这个来自宁波慈溪小镇农民家的儿子不禁为眼前的繁华兴盛所惊叹，如果能在这一片开创自己的事业该多好啊！摸着口袋里父亲辛苦积攒多年的几千元钱，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武汉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汉正街这个大市场里，我开始了为商户送货的打工生涯。废寝忘食、起早贪黑，我不辞辛劳；仓库发货、上门推销，我虚心好学。春来秋去、寒来暑往，经过几年的打拼，我终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05年，我创办了武汉永佳体育用品公司。几年后，由于诚信务实、勤奋敬业，不久我即代理湖北省二线城市批发业务，让自己的事业做得

风生水起、大有起色。现在，我成立了武汉源动力体育用品、信永佳体育工程设施两家公司，分别在武汉三镇设有多家门店，专营尤尼克斯、世达等知名品牌的零售、团购。通过努力拓展业务、广结人脉，公司业绩逐步增长，年销售额从原来的200多万元飙升到4000万元左右。

事业上有所成就，我在社会工作上也不居下游，当选为武汉市宁波商会副会长、慈溪市武汉商会会长。在努力办好各自企业的同时，商会十分注重社会慈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个人的成功既源于自身努力，更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我们一定要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2017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带我的两个孩子去体育馆打球，这哥俩跑得飞快，我在后面赶得气喘吁吁。快到体育馆门口时，

差点与人撞上，抬头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老杨。老杨是税务局的干部、老党员，我从家乡宁波初来武汉时就认识了他。当时我年纪轻轻，涉世不深，是老杨教会了我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和遵纪守法的规则。记得他常跟我说，做人要讲究诚信，做事要追求格局。十几年来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愈来愈红火，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几年不见，分外亲切，寒暄了几句，见他行色匆匆，孩子们也在等着我，我约他一定抽空来我店里叙叙旧。

几天后老杨如约而来，问起他那天匆忙的原因，他说退休后闲不住，家乡学校特聘他为校外辅导员，那天正赶回去参加见面会。提起家乡，特别是家乡的孩子们，老杨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老杨的家乡在五峰县，属于土家族自治县，四面环山，有些孩子住在山里面，上学需走十几里山路，更有许多家庭贫困的孩子，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剩老小，到校读书实属不易。谈到此处，他

看着店堂里陈列的体育用品说，这些对于他家乡的孩子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听了老杨的叙述，看到老杨的目光，想到山区孩子们的境况，当夜我失眠了，披衣走到院子

里，望着皎洁的月光，思绪万千。我从小也是个穷孩子，家境不甚宽裕，酷爱学习的我，好不容易读完高中，也只好辍学打工，千里迢迢来到武汉。是改革开放的大潮锻炼了我，是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成就了我，是党的殷切教导培育了我，使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位民营企业家，使我从一个无知青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饮水应思源，知恩当图报”，我仿佛从老杨所说的这些贫困小学生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瘦弱的身影，他们需要我们的资助，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援。

宁波人素有乐善好施、热心教育的传统美德，于是，我在商会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资助山区贫困学生的想法。得知孩子们的困难，会长们一致支持我的建议。会长郑奋勇当即让我联系老杨并拿出方案，监事长余建栋与我商议助学方式，党支部书记徐庭余和支委罗立平也提议将赴五峰助学作为主题党日活动。老杨得知我们将资助五峰贫困学



2020年，浙江企业联合会（总商会）党员突击队成员马红军（左一）一行于三八妇女节当天慰问浙江援鄂医疗队李兰娟院士（左四）

生，火速赶回家乡联系，两天后他将 30 名困难学生的情况登记表送到我们面前。商会和党支部立即召开了会议，宣传了政府扶贫助学的号召，介绍了贫困学生的情况，大家纷纷表示愿为国家分忧，为社会解难，都说道：饮水不忘掘井人，自身发达了，更要帮扶困难群体。这 30 名贫困小学生当即被认定为帮扶对象，每人每年可得到 2000 元的资助金。

漫长炎热的夏季刚刚掠过一缕清风，我们商会企业家一行 30 余人路远迢迢从武汉赶赴五峰。为了让自己资助的孩子们及时接受教育，党支部将活动时间定在暑期内，企业家们共同参加为长乐坪镇中小学贫困学生举办的爱心助学活动。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时，学校党支部文书记带领小学生及家长已在校门外等候。我们向学校捐赠了 10 万元助学金，并与 30 名小学生结对帮扶。作为商会副会长、支部宣传委员，我个人向

学校捐赠了近万元的体育用品，并结对帮扶了 3 名小学生。活动现场群情激荡，大家一致认为扶贫先扶智、帮困先育人，真诚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学校领导十分感谢宁波籍企业家的大爱义举，该镇副镇长和教育局局长为我们献上“心播长乐，爱在土家”的锦旗，对宁波商会的大爱之行表示崇高的敬意。

活动结束后，大家分头走访了帮扶的贫困学生，我们夫妇与孩子们随即来到我结对帮扶的 3 个学生家里。

其中，我帮扶的七年级学生邓仲蓉是个文静内向的小姑娘。她的父亲在她满月那天因车祸身亡，母亲改嫁回原籍，留下幼小的她由祖父母抚养。老人年老体弱，除政府救济外，靠挖葛根贩卖贴补家用。小邓很懂事，课余常常帮爷爷奶奶干活。看到他们陈设简陋的家，我的眼圈不禁红了。我爱人拉着小邓问长问短，回汉后还经常与她电话联系，为她寄去学习和生活用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听说武汉封城，小邓第一时间拨通了我的电话，叫了声马爸爸后就泣不成声，得知我们安好才放下心来。

我帮扶的另一个孩子叫杜鸿杰。他的父亲长年在外出打工，很少回



2020 年 8 月，马红军（左二）向湖北五峰长乐坪镇学校的学生捐赠助学金

家。懂事的小杜课余经常帮母亲干活，还翻山越岭为奶奶送菜送粮。小杜热爱体育运动，是班上的文体委员，阳光向上的他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项体育比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的孩子们也与他打得火热，当即就在屋外场地上踢起了球，看到他们欢声笑语、亲如兄弟的游戏场面，我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帮扶的第三个孩子叫丁伟辰。这孩子十分瘦弱，读五年级了，身形却像一年级的学生。因父母离异，母亲长年在外打工，平日仅靠外公照料。他家离学校较远，走完十几公里路后还需经过很长一段山路，我们大人都爬得气喘吁吁，两个孩子更是叫苦不迭，我看看身边的小丁，真不知这个瘦小的孩子每天坚持去上学需要多大的毅力。小丁话不多，腼腆得像个女孩子，虽然家庭困难，但学习努力，品学兼优。问到他长大想干什么，他红着脸半天才说，他想当老师，也在这里教书，让更多山里的孩子学到知识。说来也巧，我与小丁的合影被我父亲看到，他老人家说这小丁长得与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疫情过后，我收到五峰寄来的包裹，打开来有红枣、木耳、核桃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马爸爸一家身体健康。仔细一看，原来是小丁寄来的。仰望着西天的云彩，我不禁思念帮扶的几个学生，决心继续资助他们，让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五峰归来之后，我的孩子们也似乎改变了不少，不再一心想穿名牌，艰苦朴素了许多，也不再贪吃贪玩，还经常帮妈妈做点家务。国庆节时，见他们嘀嘀咕咕，细问起来才知道兄弟俩准备将积攒的零用钱购置文化用品寄往五峰。我们大人的行为影响着孩子，只有自己做到勇于担当、大爱无疆，孩子才会乐于助人、热心奉献。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民营企业家人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勇于创新，增强爱国情怀；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民营经济、如此推崇民营企业家，我们应该为国为民多作贡献。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孩子的成长是祖国的希望，“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一定要关心爱护他们，使他们沐浴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在慈善回报社会、爱心共创和谐的思想指导下，多年来，武汉市宁波商会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助学活动，累计捐赠近300万元，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为支持政府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作出积极贡献。今后，我们更要紧跟党中央的步伐、不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和重托，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中国青少年教育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为需要关爱的贫困学生家庭撑起一片蓝天！

（马红军：武汉源动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市宁波商会副会长）

当好武汉地铁“最强站长”

◇ 姚 婕（口述） 白爱萍（整理）

“请问到武昌火车站怎么坐车？”

“我要到武汉站，可以在哪儿换乘？”

“我想坐公交车到汉阳，应走哪个出口出站？”

……

类似的问询，我每天大约要接受 600 多次，我会微笑着一一回复。

我叫姚婕，现为武汉地铁 2 号线汉口火车站中心站长。2020 年，我光荣地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一）

我与武汉地铁的不解之缘始于 2004 年。那一年，20 岁的我从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进入了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客运部 1 号线宗关站，成为了一名站务员。

其实入职伊始，我并不喜欢这份职业，认为站务员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既单调又枯燥乏味，做了没几天，就打起了退堂鼓。我对父亲表达了想换工作的意愿，满心以为会得到一向疼爱我的父亲的支持，没想到父亲一盆凉水迎头浇了下来：“才做了几天就想放弃？年纪轻轻一点苦都吃不得，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还能做什么事？抱着这种心态，换做别的工作你也别想做好！”

年轻气盛的我被父亲说懵了，回过神后，我“不服周”的倔强劲儿上来了：“你说我做不好这份工作，那我偏偏做好给你看！”我年轻躁动的心沉了下来，开始重新

审视站务员的工作，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从回复地铁乘客的每一次问询做起。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份工作，意识到了“服务无小事，件件要走心”。而这一“走心”，也成就了我的多彩人生。入职武汉轨道交通运营行业16年，从地铁1号线到2号线，从宗关站到东吴大道站再到汉口火车站，我始终坚持在客运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乘客服务，从普通站务员成长为值班站长乃至中心站长，收获荣誉无数，被喻为武汉地铁“最强站长”。

（二）

在汉口火车站，我是出了名的问不倒的“活地图”，这不是我用百度“度”出来的，而是用双腿走出来的。

2012年年底，武汉市第一条地铁线路轨道交通2号线开通运营，我和同事们一起走进了武汉市第一个与国铁无缝对接的地铁站——汉口火车站，这一“站”就是8年。

地铁汉口火车站每天人流熙来攘往，且大部分都是刚下火车进入地铁站、带着大箱小包的外地乘客，客流量大，而且呈集中性、爆发性，高峰时段每小时客流量达上万人次，单日客流量维持在10万人次以上。面对全新的地铁、复杂的工作环境，我从熟悉站台周边做起，坚持一贯的“用心服务”理念，处理好经手的每一件事情。我利用休息

时间拿着纸笔到公交站去抄站牌，摸清途经汉口火车站的24条公交线路，做到烂熟于心，以便更好地为乘客服务。

在约3万平方米的站厅，我每天要来回行走至少10公里，常常一两分钟内就有几波人上前排队问路，我都会一一耐心、详细作答。车站共有6个出入口，还有一些地下的连接通道，方向多、柱子多、视线不好，给人指路的时候，经常有人听完还是搞不清楚方向。我便不厌其烦地仔细比划，实在说不清楚，还会亲自给他们带路。

问的人多了，我也慢慢总结出了规律，我发现乘客问得最多的是如何换乘去武汉火车站和武昌火车站，于是针对这两种情况，我自己设计了简洁明了的换乘卡，卡片正面标明如何换乘，背面是所有换乘站信息。再遇到有外地旅客或年长乘客记不住换乘路线时，我就主动把换乘卡送给他们。

除了换乘卡，我还制作了武汉地铁高校导乘图。武汉高校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新生拖着行李出火车站乘地铁到校报到。面对



2015年夏，姚婕（左）在武汉地铁2号线汉口火车站站厅帮助乘客

众多新生的询问，站里许多同事总是忙不过来。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13年，我和同事一起，利用休息时间，坐地铁转公交。1个月后，“高校交通信息表”出炉。2015年8月，我又带着两名同事耗费3个多月的休息时间，访遍武汉三镇80多所高校，制作出更新、更全的武汉地铁高校导乘图，免费向有需要的乘客发放。导乘图上清楚地标明了每一所高校的位置、乘坐地铁线路及公交的换乘方式，甚至连下了公交后怎么走都详细地列了出来。移动版的高校导乘图还能看到“高校证件照”，新生可以通过照片核对学校信息，避免走冤枉路。

如今，我仍然经常主动出去探路。武汉发展太快了，地铁线路越开越多，公交线路经常调整，我不希望自己因信息滞后误导了乘客。

（三）

作为地铁汉口火车站中心站长，调度是我的重要工作，逢节假日及客流高峰，我总是冲在疏导客流的最前线。通过分析大客流规律，不断摸索，思考实践，我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成为车站客流组织和班组管理的“教科书”。

在我的荷包里，放着一张快揉烂的“火车时刻表”，这是为了解火车到站时间，特意找铁路工作人员要的。当时铁路工作人员还纳闷：地铁站为什么要火车站的时刻表？

每年春运，地铁汉口火车站都要经受大客流考验，我会根据汉口火车站实时到站的旅客数量来调整地铁站内的客流疏导方案。有了这张时刻表，春运期间，火车在各个时间段有几趟车到汉口，我都成竹在胸，而且我还会不时去了解晚点的火车车次，如

果当天有大量火车晚点，我会增加地铁自动售票机内的钱和票，适时引导乘客分流。

节假日，铁路部门会加开临客，对于这些临客车次，我也会去一一了解。如今，这张“火车时刻表”已经成了地铁汉口火车站的“客流疏导宝典”。

我还想方设法为夜班火车乘客快速进站提供方便。临近收车时间，地铁汉口火车站时常会有行动不便的乘客因为购票及安检，错过末班车。于是，我会在上夜班时提前购买几十张2元的单程票，在进站客流最大的出入口为乘客快速办理人工售票，帮助他们快速进站。这一举措得到市民的一致点赞，于是武汉地铁集团出面统一制作了“补票凭证”，乘客领取凭证从专用通道进站乘车，出站时凭票补交车费。据统计，仅地铁汉口火车站和武汉火车站两个车站，节假日日均发放补票凭证约60张。

继夜归人后，我又注意到了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一部手机走天下，可总有一些年轻人刷卡进站时才发现卡里钱不够，他们身上没带现金，只好在站厅内逗留。于是每次当班时，我会在兜里准备五六十元的现金零钱，差个一两块，我就帮他们补上，他们再用手机转钱给我。每次下班时，我口袋里的这五六十元都会用光。

（四）

进入地铁工作以来，我经常“捡东西”。2号线开通至今，地铁汉口火车站已累积了4本厚厚的失物登记簿。对待每一件失物，小到一个布袋，大到一部笔记本电脑，我都会想尽办法寻找失主，甚至被班组同事戏称为“侦探姚”。对于找寻难度大的，我会另辟蹊径，根据蛛丝马迹，尽力寻到失主。

2013年9月25日，我上夜班，白班同事捡到一个GUCCI包，里面有手机、相机、一张名为何某的登山证、2050元现金及部分资料。手机有密码无法查询通讯录。通过车站广播等方式，过了一下午，失物仍无人认领。我在另一名同事的见证下，仔细检查包内物品，发现一张商铺招商李经理的名片，抱着一线希望拨打名片上的电话，但对方却不相信我的话，说我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并挂断了电话。

我没有气馁，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我再次拨通李经理的电话，并提供了自己的姓名、工号、办公电话、手机号码，并再三强调我只是需要失主向车站打个电话就行。最后，李经理终于告诉我，自己的客户名单中确实有一名叫何某的人。2分钟后，失主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因为太过激动而颤抖：“我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包还会还给我，太谢谢你们了！”当天夜里11点多，失主赶到地铁站，从我手里接过了失而复得的包，执意要酬谢地铁站工作人员，我没有收，我对失主说自己只是在做本职工作而已。

几年下来，我和我的班组同事共为价值20万余元的900多件失物寻回了失主，是全线车站归还率最高的。

除了“捡东西”，我还经常“捡人”。

2014年3月28日晚11点，突降大雨，一天的运营接近尾声，我照例在站厅内巡视，突然看见一位一手提行李一手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坐在站点F出口的楼梯上，表



2020年11月，姚婕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场留影

情十分无助。我马上走上前询问。原来年轻妈妈没有带伞，出地铁后发现雨下得很大，担心孩子淋雨生病，只好回到车站，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家人，准备等雨停了再走。我担心孩子吹风着凉，将母子二人带到站长室休息，烧好水给宝宝冲奶粉，换好尿不湿，并借电话给年轻妈妈联系家人。第二天凌晨1点，其家人才赶到车站，我让保安师傅打开车站卷帘门，把这对母子安全交给家人。宝宝的外公感激地说：“武汉地铁的服务真心好，这件事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地铁汉口火车站南来北往的乘客很多，我经常发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2013年7月18日，我透过车控室玻璃窗，看到一位身穿中山装、背着布袋的老人，独自一人在车站徘徊，步伐有些不稳。我觉得有些异样，连忙出去问道：“有什么能帮您的？”老人神情焦虑，手紧紧抓着布袋，不愿意与我多交流。我耐心地询问老人的行

程安排，最后得知老人来自佳木斯，来汉想投资加盟某保健品项目。直觉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警觉地找来了驻站民警，通过查找该保健品公司证实了这是一出骗局。听到保健品公司并非真实存在，投资挣钱的梦转瞬化作泡影，老人精神上遭受了十分大的打击，瘫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为老人买来热饭热菜，耐心安抚他的情绪，悉心照料。最终，在车站和公安民警的努力下，为老人开辟了回家的绿色通道。事后，老人家属送来一面“好人一生平安”的锦旗。而像这样的锦旗，站长室的四面墙几乎挂满了。

（五）

16年里，我和我的团队安全组织运送乘客3亿人次，相当于把整个武汉市常住人口运送了27次，我视乘客为亲人，以匠心做服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工作业绩。我带头创立的“笑容多一点，真心；专业精一点，诚心；行动快一点，热心；说话轻一点，爱心”的“点心工作法”，成为武汉地铁“微笑服务”荣获“中国运输领袖品牌”的强劲助推器；我和创新工作室成员一起发明的“地铁自动售票机单程票缓存装置”解决现场实际困难，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申请；在我的带领下，地铁2号线汉口火车站获得湖北省工人先锋号、湖北省文明示范窗口、武汉市青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而我本人也先后荣获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等殊荣。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客流最大车站的中心站长，我立即向部门申请调整员工工作

岗位，增加防护措施，减少传染机率。地铁停运后，我主动报名到车站值守，自己动手用稀释的84消毒水对办公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并定向捐赠3000元给医院和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20年年底，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11月24日，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们齐聚北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这一次，我郑重地穿上了武汉地铁独有的玫红色制服，这也是武汉“地铁红”第一次闪光在人民大会堂。

地铁是一座城市文明和形象的窗口，我是和武汉地铁一起成长起来的，通过服务换来旅客的一声声感谢、一张张笑脸，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是我的高光时刻，但这更是武汉地铁人的集体荣耀。今后，我将继续秉持“乘客至上、品质一流”的服务理念，从每件平凡的小事做起，当好乘客的知心人，让“地铁红”成为武汉的靓丽风景，擦亮城市的文明底色，散发城市的温度和热度。

（姚婕：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客运二中心地铁2号线汉口火车站中心站长；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为初心 做匠人

◇ 徐击水

我叫徐击水，1963年4月生，中共党员。1984年，我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同年留校任教，现为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武汉奋进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机器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1995年，我加盟奋进公司，当时叫武汉奋进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是我学生创立的公司。在随后的时间里，我相继创立了武汉奋进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负责人及技术带头人。如今，奋进电力已成为电力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其主打产品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奋进智能是国内工匠机器人第一品牌，其主打产品——酿酒机器人填补了白酒行业技术空白，该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90%。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业工作和经历。

创业思奋进 下海试身手

1987年，我参与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水中结构喷砂除锈机器人研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业机器人。该项目非常成功，但是制造成本相当昂贵，在当时花了8万元，折合到现在差不多800万元。这是当时湖北省第一台工业机器人，虽然没有大面积推广，但是在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教师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自己造机器人！

可能是由于我骨子里爱折腾的性格和无法割舍的工程师情怀，1995年，在学生的再三邀请下，我毅然放弃了教师这个“铁

饭碗”，并创办了奋进电力，从此走上了漫漫的创业路。

可想而知，像我们这样一群为了情怀走在人组建而成的团队，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言而喻。每天行走在公司生与死的边缘，磕磕绊绊。那时候，为电力系统服务的企业强手如云，奋进电力夹缝求生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去这些大企业不愿进驻的偏远地区或不赚钱的小分站，当时被业内戏称“捡面包屑”。

直到2000年，由于一场空难，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暂时放弃了恩施市场的服务，一时间，恩施电力调度系统陷入瘫痪。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主动请缨，愿意为这一调度系统提供免费的维护服务，并带领员工常驻恩施。几十个日日夜夜，攻坚克难，不仅解决了原有的问题，还升级了用户的系统。我们的用心服务和技术水平感动了用户，恩施电力公司第一次认真审视了我们这家小公司，最终决定让我们承担恩施所有相关供电项目。

有了示范，奋进电力活过来了。然而我没有感到轻松，我始终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研发的调度系统虽然先进，但入市较晚，优质客户已被大型企业垄断，如果继续跟在他人屁股后面跑，只会是死路一条。

怎么办？如何突围？创新，还是另辟市场？我当时头脑里有很多问号。

2004年，我的一个同事在陕西汉中市进行变电站测量时，变电站负责人求援：能不能帮忙对带电作业工具的保管环境进行有效控制？这让我眼前一亮。众所周知，电力员工在带电作业时，相关的工具需要具有较高的绝缘性，才能安全生产。而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专门的存放设施，这些工具很容易因存放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影响，降低绝

缘性。电力员工若用这些绝缘性能较差的工具进行带电作业，安全隐患相当之大：轻则受伤，重则丧命。这是电力行业亟待解决的痛点。

我很快做了决定：“开发带电作业工具柜，这不仅可让公司开辟出一个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可让数十万带电作业的电力员工兄弟们远离安全隐患。”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之中。

2004年年底，改变电力行业数十年带电作业工具存放传统的新一代产品——智能化带电作业工具库房面世了！2005年，国家起草带电作业工具存放环境的行业标准，我是主要起草人。

此后，我们的创新产品研发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推出了智能绝缘工具柜、电力配网专用车、带电作业高压水冲洗清洗车、智能配网抢修车、智能库房以及带电作业工具和安全工具的试验系统等系列产品，几乎每一款产品都受到了电力系统的欢迎。

20多年的持续创新，让我们成为了带电作业及安全工器具领域的领头羊，已有14项带电作业技术与装备属国内首创，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8项，拥有国家专利70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项。

转型谋发展 五十再创业

2008年后，奋进电力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每年营收均过亿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每当公司走向平稳上升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这一次是因为一个突然的发现：带电作业及安全工器具领域的市场容量太有限了，整个市场不超过20个亿，尽管奋进电力目前在这个细分领域属于龙头企业，但未来的发展却面临天花板。

必须转型！往哪里转？我陷入沉思。

有一天，在一个朋友的工厂里，我看到一款 ABB 机器人，不经意间问了一下价格，得知是 50 多万元，我再次陷入思考。回公司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一辆汽车上万个零件，才十几万元，凭什么一台机器人，区区几百个零件要卖到数十万元，这不科学！”这件事勾起了我多年前做机器人的记忆，也刺痛了我曾经作为国内第一代机器人

开发者敏感的神经，同时，我也意识到工业机器人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星期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用得起、用不坏的机器人。

说干就干。2008 年 4 月，我们成立了机器人核心技术研究小组。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 年，第一代机器人控制器 FJC6-1 诞生；2012 年，第一台 RV 精密减速机 FRV320E 样机完成；2013 年，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FRH100-2 问世，并于同年 5 月在东风汽车车轮有限公司上线。从此，我们走上了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开发集成之路。

五年来，利用奋进电力每年 1000 多万元的持续投入，奋进公司逐渐成长为国内知名的自主品牌机器人公司。2014 年 6 月 28 日，为了奋进机器人品牌推广，我们将原有的机器人事业部成立为独立法人——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自此，奋进公司实现了第一次转型。这一年，我 51 岁。



1987 年，徐击水（右）在校参与开发了湖北省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正当大家都认为奋进机器人小有所成的时候，国外品牌机器人也完成了国内布局。为了打压国产机器人的生存空间，以 ABB、库卡、安川和发那科“四大家族”为首的外国军团痛下杀手，大幅降价，这让刚刚起步的国产机器人举步维艰。本来就没有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现在又没有价格优势，国产机器人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公司无一盈利。钱花尽了，市场也没了，奋进公司再一次被推到悬崖之巅。

后面的路该怎么走？我几乎是一夜白头。

2015 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酿酒车间，受朋友委托开发一款代替工人上甑的机器人。回到公司，我首先想到的是将现有的机器人运用到这个领域，即使用通用机器人来上甑。然而当样机造出来后，遭到客户的一口否定，因为通用机器人无法解决传统行业的问题。这无疑是当头棒

喝，还没有到现场就胎死腹中，这种痛苦可想而知。我几乎三天没合眼，突然间我蹦了起来：为什么机器人一定要长这样呢？

当我激动地把想法告诉核心团队时，换来的却是一片质疑声：这样行不通！工业机器人一直就是“四大家族”产品的这种样子，换一种样子，还是机器人吗？我想不出好的理由反驳。

然而，直觉告诉我，只有走出这种思维怪圈才有出路，凭借这么多年的市场经验和技術敏感性，我觉得必须这么做！那天，我发了生平第一句狠话：“一定要做不一样的机器人、样子不一样的机器人，所有的责任我来扛，必须听我的，我死都不怕还害怕什么？”

就这样，我们抛弃了已经经营多年的通用机器人，走向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打造行业定制化机器人，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工匠机器人。今天想想，如果不是那次变革，公司可能早就破产了。

工匠机器人 创新辟蹊径

二次转型，实现了奋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从通用机器人到工匠机器人的转型，可谓是“壮士断腕”。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让你当时做了那样的决定？”我的回答是创新，是奋进公司创新的基因。

奋进公司有个重要的烙印，就是学院派。所有的创始人都是技术出身，这些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行业首创，这给了我底气。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优势，无线测控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均在业内首屈一指，没有理由解决不了现有的困难。我越来越觉得，是思维方式制约了公司的发展。

我经常跟同事讲：创新不设限！思维方式改变了，前途也豁然开朗。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认识，我做了大量的调研，结果发现几个现状：一是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但国产机器人所占份额却在萎缩；二是绝大多数的国产机器人集中在汽车零部件、金属加工、食品包装等领域的低端市场；三是国产机器人在上述领域市场认可度不高，卖不动。同时我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除此之外居然还有大量的行业或领域需要“机器换人”，但找不到合适使用的机器人，例如白酒、茶叶、泡菜、制醋等传统行业。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

很快，我决定调整公司的主战略，将长期战略目标定义为“聚焦行业应用，打通机器人产业链，建立行业定制化工业机器人第一品牌”，并将阶段目标设定为：3至5年内，专注于提供白酒智慧酿造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白酒酿造领域先进制造技术的引领者和领导者。

思想统一了，公司所有的动能打开了。短短两个月，我们开发出了第一代工匠机器人——上甬机器人。2015年11月，在劲牌酒业枫林酒厂得到了成功应用。此后一年时间内，枫林酒厂陆续上线57台。奋进上甬机器人从此一鸣惊人，大放异彩，推动了白酒行业自动化升级。

上甬机器人是成功的，我们第一次让机器人变成了“工匠”，让它来传承传统工艺。五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工匠机器人”时，更多的是怀疑、质问和不解。然而，时间会检验一切。因为专注，让世人看到“力出一孔”的能量。今天已有超过300余台上甬机器人运行在全国各地，服务于茅台、劲酒、习酒、洋河、汾酒、古井贡酒、口子窖等三十余家知名酒企，涉及清香、浓香、酱

香、兼香等多种香型白酒的酿造，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了90%，产品的综合性能和社会经济效益已经获得了用户和社会认可。

心系产学研 做好谏言人

奋进公司一路走来，得益于省、市、区各级政府的殷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除了感谢感恩之外，还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促进行业发展和产业进步。2017年，我有幸成为武汉市政协委员，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奋进公司，我将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做好调研，深入一线了解行业和产业现状，提出有建设性的提案，认真履职，如实谏言。

由于我的过往经历和从业背景，我关注的重点在民营经济、智能制造、机器人和产学研等几个方向，特别是围绕以下几个课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第一，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应发挥的作用。如实反映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例如资金压力融资难、人才困境、产业政策以及发展方向不明等，并多次发起民营企业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如何正确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发展自己，服务社会的主题探讨。第二，有关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探索。

《中国制造2025》规

划了我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武汉市作为全国制造业发达的重要城市，不能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掉队，如何推动智能制造行业发展，尤其是推进机器人产业的布局、新兴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创新融合，是我比较关注的方向。第三，作为从高校走出来的创业者，尤其重视产学研用的协调发展，关注教育资源优势的合理利用和科技人才的本地化发展问题。

为了能提出切入实际、击中要害的问题，为了能拿出具有建设性和实践性的提案，我跟自己提了三条要求：做好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争取率先示范。作为湖北省机器人产业联盟的理事长单位，奋进公司这些年来一直十分关注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进程以及我省和我市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现状，看到全国各地机器人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我感到有些着急，我不希望我们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落后。为了真正弄清我省及我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和联盟的工作人员多次走访机器人产业链上的相关



2016年，徐击水在车间对新型上甌机器人进行测试

企业 50 余家，了解他们发展的现状、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的方向，真正倾听一线的心声，并组织专家编写了《湖北省机器人产业调研报告》《湖北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建议》《武汉市工业机器人专题调研建议》等资料。

我深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实事求是反映民情，深思熟虑建言献策，是我的责任，也是人民赋予我的义务。近年来，我充分利用政协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积极将民营企业家的的心声传达到政府耳中，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提案。在发展武汉优势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才优势，如何留住人才，如何 5 年留住 100 万大学生，除引进大企业外，需要武汉发展、崛起一批高新企业，为大学生留汉创造充足岗位。然而给予刚毕业大学生应有的待遇，对中小型高新企业来说还是有不小的难度，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人才更大的支持，鼓励创新创业，吸引外流人才的回流，营造高端制造业的创业氛围，培育新兴智能制造产业高地。人才留住了，就会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入驻武汉，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发展方面，我主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并提出工匠机器人的发展思路，即瞄准细分市场，开发深度定制工业机器人，从小切口推动大产业发展。在民营经济的创新创业发展主题上，我认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遇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如何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水平，着力打造龙头企业，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出台创新性支持措施。我希望民营科技型企业能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以激发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及投资的热情。建议培育本市 2 ~ 3 家机器人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必须拥有核心

技术、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最前端的地位，与此同时，围绕龙头企业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除此之外，我还提出了《关于强化武汉教育资源优势，发展武汉智能制造产业的建议》《关于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等提案。

建言献策是我作为委员的职责，率先示范是我职责落实的基础。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家，特别是年轻的企业家，我身兼多个“双创”基地的创业导师，将我的创业经历与大家分享，与大家一起探讨科技和产业发展。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奋进公司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工匠机器人的创新道路，让更多中小型科技企业看到了创新发展的潜力。我很幸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与所有追梦人一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起去实践，一起去见证。

（徐击水：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的抗疫故事

◇ 邝远平

2020年年底，我非常荣幸地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授予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称号，这是祖国和人民给予中国退役军人的最高荣誉，我倍感自豪和珍惜。

2020年伊始，远在悉尼的我早早买了机票，准备1月27日返回武汉。可是疫情打乱了计划。

武汉封城，交通阻断，我只能蜗居他乡。得知武汉疫情的消息，我心急如焚。我是从湖北武汉走出去、在澳洲生活和工作的华侨，许多家乡父老、亲朋好友都身处疫情一线留守奋战，我自己虽然身在澳洲，但食不甘味，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危。

于是，我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澳洲和湖北组建1000人的抗疫志愿队，以海外湖北社团合作联盟的名义向全球78个国家的湖北社团发出倡议书，号召向武汉抗疫

一线奉献爱心，得到各地社团的积极响应，募捐逾亿元医疗物资，分300批次送到武汉、黄冈、孝感、仙桃、黄石、宜昌、鄂州等地，并牵头号召亲友及自己创办的华人集团旗下几十家公司捐款捐物超过2000万元，支援祖国一线抗击疫情工作。

两次包机

疫情期间，我和儿子邝幸牵头在澳洲到处搜罗，用比平时高出两三倍、甚至更高的价格，购买医用防疫物资，用包机运回武汉。

组织包机说起来高大上，做起来“难于上青天”。

2020年2月16日，我们通过中国侨联公众号、中新社、《长江日报》、《澳洲日报》等媒体公开向澳洲和新西兰华人华侨发出召集令，自费包机免费帮助侨界承运捐赠



2020年2月，邝远平（左二）在万纬物流集团悉尼仓储中心接收防疫物资

物资，从悉尼直飞武汉。此令一出，应者云集。短短两三天时间内，接收到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和新西兰奥克兰6个城市的各侨团、爱心侨胞捐赠的物资。

与此同时，我还与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湖北省药监局、湖北省卫健委、湖北省侨联、武汉市侨联等相关部门保持畅通联系，积极为全球湖北社团和华人华侨捐助物资、捐款采购和武汉封城期间的物资直达等做好沟通协调服务。我们不眠不休地在澳洲就地采购、集装、打包、运输，厘清各种进关手续，与受捐方直接衔接沟通。

为了尽快将防疫一线最紧缺的物资运抵武汉，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华人集团与碧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会、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等机构携手包机驰援。我记得很清楚，2月24日晚21时，从澳大利亚悉尼起航的满载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飞机顺利抵达武汉。

相比这一次包机，第二次包机更加曲折。

3月20日，澳洲疫情吃紧。在澳华侨的安危牵挂着祖国的心。正如3月27日，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湖北省海外联谊会会长尔肯江·吐拉洪在援助海外侨胞抗击疫情捐赠仪式上说：“自国内疫情发生以来，华人华侨为湖北捐助大量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为控制疫情作出巨大贡献。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现在澳洲有难，

我们理当涌泉相报。”

如今回忆那段包机的经历，我仍心有余悸。其实第二次包机原定3月27日晚飞赴澳洲。在此之前，我派人到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请他们加班加点，优先生产20万只N95口罩和价值8万多元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及纱布绷带。拉货的司机蹲守到3月26日凌晨5时，满载物资直至中午才运到武汉，为了早日备齐所需物资，我们只能分秒必争。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3月28日，澳洲政策突然调整，医用口罩进口必须有TGA认证。得知这一情况，我急得不行，几百万元的货物可能打水漂。我四处托人，找侨领，找澳大利亚联邦议员，找澳贸委武汉代表处负责人，甚至找中介代理公司，但一切努力最后都泡汤了。我们不得不紧急申请退库手续，退掉这批货。

当时更为棘手的是飞机从武汉起飞的问题。国家民航局批复的是，包机3月27日起飞。但是，按照中国外交部和国家移民局的最新规定，外籍人不能入境，由于

我们的出租方是海航集团旗下的金鹏航空，其机组人员中恰恰有4名外籍飞行员，如起飞，他们就回不来，于是我们不得不取消包机。那时大家都说放弃吧，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完成，但仍咬紧牙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面对国内外医疗器械标准不一致、货源不稳定、国际运费飞涨等诸多困扰，我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一直奋战在筹集物资协调运输的一线。克服重重困难后，包机终于成行。

4月8日，我再次通过集团旗下子公司洛阳数谷商贸有限公司组织包机，支援澳洲。

此次航班是武汉解封之后天河机场恢复的首架国际商业货运航班，满载70余吨防疫物资直航悉尼。仍由我创立的华人集团牵手海航集团金鹏航空、九州通医药集团、维爱佳集团、澳农生鲜、澳中慈善协会、澳洲湖北同乡会等单位发起组织，募集了口罩百万只、防护服上万套、医用手套10万双及护目镜等，用于支援澳洲人民、在澳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次日上午，包机从悉尼返回时，又满载澳大利亚华人集团捐赠的澳洲羊肉、三文鱼、奶粉等生活物资支援湖北武汉复工复产。这是武汉天河机场口岸恢复启用后首批进口的肉类等物资，有4万公斤澳洲羊肉、2000余箱奶粉及1000公斤大西洋鲑鱼，价值600多万元。这些物资定向捐赠给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外公布的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支援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医院、学校、儿童保健院、幼儿园、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

除了物资捐赠，我还联络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先后创作了《让爱回家》《武汉欢迎你》《我们在一起》等抗疫主题歌曲，为困顿中的武汉加油鼓劲。

四代抗疫

2020年3月，宜昌枝江问安镇便民服务中心举行物资捐赠仪式，枝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葵与远在澳洲的我进行了电话连线，代表枝江人民感谢我们一家四代人以及澳洲侨团对枝江的深情厚谊。

问安镇离枝江市区15公里，国土面积160平方千米，辖23村。我远居澳洲，隔着千山万水，怎么选上了这个偏僻乡镇？

作为枝江的招商招才顾问，往年我曾去枝江谈项目，与问安镇有联系。相传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相争，刘备于南阳新野战败，两位夫人辗转于此，关羽每半月去问安，故此得名。有情有义之地，让我印象深刻。



2020年12月，邝远平被授予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

此次疫情中，该地区乡镇卫生院缺医少药，更没有制氧机。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就在琢磨用何种法子帮其渡过难关。

于是，我和老妈、儿子商量，每人捐赠一台价值近 6000 元的美国产医用制氧机，同时捐赠医用防护服 500 套，为抗疫贡献微薄之力。

我的母亲 81 岁了，一生节俭，行善不止。从新闻中看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消息，她老人家听说有医院缺少防护服，非常着急，于是立马拿出 5 万元私房钱，让我帮她买 500 套防护服送去。

我向她提起给问安镇捐制氧机的事，她立马就同意了，不用过多解释。有这位大仁大义的老妈做表率，我岂能不仿而效之？

这次疫情，儿子天天跟着我鞍前马后，忙着采购、统计、运输、装机。他忙碌的身影确实让我刮目相看。更为难得的是，他个人捐款 20 万元人民币的同时，还发动朋友、合作伙伴慷慨解囊，加入抗疫行列。这让我甚感宽慰：这小子比以前懂事多了，大义当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条汉子。

我和儿子一谈起捐制氧机的事，他毫不犹豫，满口应承，还主动提出以 3 岁半女儿的名义也捐一台。小不点的压岁钱就这样被“挪用”了。为了疫情早日过去，我们全家人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与人为善、积善成德、仁德至上，这都让我时刻想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见不得那些困厄、危难与不公。

无怨无悔

我经历了 1998 年的抗洪和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任何灾难发生时，我都从不缺

位，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帮扶贫困学生，从来不甘人后。

这次投身抗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卫视、今日头条、凤凰网等数十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我的事迹。

与此同时，受捐单位的感谢信更如雪片一般飞来。4 月 30 日，武汉市委、市政府专门给我担任执行主席兼秘书长的海外湖北社团合作联盟发来感谢信：“在武汉抗击疫情最紧要的关头，在武汉人民最急需帮助的时刻，贵联盟积极响应，第一时间成立‘侨领联盟抗疫工作小组’，向全球 78 个海外社团合作联盟单位发出捐款捐物倡议。充分体现了侨界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守望相助的社会担当，为我们战胜疫情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为抗疫，我心力交瘁，午夜梦回，泪湿枕巾，但无怨无悔。其实，疫情中的所作所为，本不足挂齿，但大家记着念着，还特地写来这一封封火热的感谢信，让我感动莫名。其实，我很惭愧，我只不过报答恩重如山的祖国，一言一行但求能回报社会万一。还真应了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那一封封暖心的感谢信，是动力，更是鼓励；那一封封激情的感谢信使我信念更坚定，“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邝远平：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侨联副主席，澳大利亚中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人集团董事局主席）

我在水生所做研究

◇ 刘仁俊

我于1963年9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事长江鱼类生态学研究，走遍了长江沿岸的大小河流和湖泊，踏上了名副其实的走江湖生活，收集了大量的长江鱼类年龄与生长、幼鱼和鱼苗预报的生态资料，为长江渔业生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78年，由于国家需要，我从研究长江鱼类转行研究长江白鱓豚和长江江豚的保护。

白鱓豚的成功饲养和研究

1980年元月12日，我们从湖南岳阳城陵矶获得了一头严重受伤的活体白鱓豚。它的颈背部被渔民用铁钩钩了两个直径4厘米、深8厘米的对穿的大洞。在水生所鱼池里养了5天，它的伤口严重发炎化脓，身体失去平衡，危在旦夕。我们请来了北京动物园的两位兽医为它治伤，他们用给陆生哺乳动物治伤的方法治疗，虽然效果不错，但是

用双氧水为伤口消毒的方法，把白鱓豚颈背部的皮肤严重烧伤。我坚持不能用这种方法治疗，但这两位兽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放弃，回了北京。

所领导都十分关心国宝白鱓豚，并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淇淇”，为稀奇、水生珍稀之意。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淇淇颈背部大面积伤口在饲养池中不断感染腐烂。我在饲养池边，天天守候，冥思苦想。淇淇在水里生活，伤口完全暴露在未经消毒的水体环境中，尽管我们一星期为它换一次药，但一回到水中，药物很快就溶解到水里，失去疗效。我们人类治疗伤口是用纱布包扎起来使药效得以发挥。因此，我想为白鱓豚穿一个特制背心，把治疗的伤口盖住，从而维持药效。经过专家、领导和同事们的反复研究讨论，同意用我的治疗方法试一次。

我们把淇淇腐烂的伤口清理干净，用生理盐水消毒，再涂上维氏油膏、生肌散、云南白药，用浸泡过药物的纱布盖住伤口，

再用四层涂满医用凡士林的纱布盖住整个创伤面，最后给淇淇穿上我特制的背心。看着穿上背心的淇淇非常舒服地在池里游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五天之后，我们给淇淇换药，一打开背心，奇迹出现了，淇淇颈背部伤口周围的皮肤全部长好了，真好，美妙极了。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颈背部钩伤的大洞等其他伤口也被治愈。这样，我们日夜牵挂的受伤的淇淇终于康复了，大家真高兴。

我们把淇淇治伤的过程拍成了视频，白鱉豚研究组陈佩薰组长在英国参加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国际会议时，在会上向与会学者播放了这个视频。由于国际上从未见过白鱉豚，外国专家们说：“中国人，居然用土办法，把受伤如此严重的白鱉豚治好了，真是奇迹！”大家一致要求将视频反复播放，从此，白鱉豚淇淇名扬世界。

方毅同志为淇淇建白鱉豚馆

名扬四海的白鱉豚淇淇开始一直养在非常简陋的鱼池中，后来转移到一个“干打垒”的水泥池中。几天以后，池中的自来水很快就被藻类、尘土和细菌污染，对淇淇的健康造成很大威胁。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来武汉考察，当他看到“国宝”白鱉豚养在如此简陋的土池子里非常心痛，当即表示支持我们200万元建白鱉豚馆。从此我们拿到了建设白鱉豚馆的第一桶金。

接着，我又找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竺玄同志要了380万元。经费落实以后，我们又向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先后争取到了2亿日元的器材和经费支持，并由日本住友公司亲自来安装。这样我们就拥有了7套先进的

过滤设备、7套美国滤罐、2套36千瓦的冷却设备、2套臭氧设备和2套加氯设备。

建设白鱉豚馆的经费有了，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类似的鲸类动物饲养馆，也还没有人有能力设计和建造。所以，我只能根据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撰写了《鲸类动物饲养设施工艺设计》这篇论文，并去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院为他们作了一个关于白鱉豚馆工艺设计的报告，详细汇报了白鱉豚馆的总体设计、内部结构、饲养池的布局、大小、形状和深度等，受到了设计院同志们的肯定。他们说从未见过这么详细的工艺设计报告，这下会建了。此后，在设计院同志们半年多的努力下，中国第一座鲸类动物饲养馆——白鱉豚馆建成并投入运行。

白鱉豚馆于1992年正式建成开馆，方毅同志还亲自为其题名，可见方毅同志为白鱉豚馆倾注了许多心血。建馆之初，时任中科院水生所所长的陈宜瑜先生叮嘱我，我们的白鱉豚馆一定要建成20年不落后的先进饲养设施。我可以说的不负嘱托了。

1997年10月17日，方毅同志逝世后，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悲痛，给《中国科学报》写了《方毅同志和白鱉豚保护》的怀念文章，科学报刊登后，立即被《光明日报》和《回忆方毅》文集收录，也寄托了我对方毅同志的深深怀念。

长江江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迎来希望

由于长江鱼类资源的衰竭、滥捕滥杀，航运事业的迅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白鱉豚的生存环境，最终使得它们走向功能性灭绝。但是白鱉豚的研究成就了一批长江鲸类动物保护研究的专家和队伍，使他们积累了宝贵的保护经验。1992年，在石首和洪湖

先后建立了长江白鱔豚的自然保护区，也为长江江豚的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研究白鱔豚期间，同时研究了长江江豚的分类、饲养与繁殖。1990年和1993年，我两次带领团队为石首白鱔豚保护区捕进了10头长江江豚。之后在水生所科学家和石首保护区的共同努力下，又补充了一些，这些江豚可以在保护区自然繁殖，到20世纪90年代末，共有长江江豚80余头，每年都有10余头江豚出生。

为了保证长江江豚在长江的保护与繁衍，在水生所的积极推动下，2015年，湖北监利何王庙长江江豚保护区成立，那时已有18头江豚的繁殖群体。根据水生所主持的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统计，当时长江仅有1012头长江江豚。

2016年1月，习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随后，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已被摆在压倒性位置。201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为治好“长江病”开出了“药方”。

随着“长江大保护”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长江珍稀物种——白鱔豚和长江江豚的保护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8年，著名主持人董卿特邀我去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栏目，和她一起做节目，分享了我对于白鱔豚饲养和保护的人生经历。节目做得很精彩，很成功，影响也很大。2020年年初，著名主持人撒贝宁也邀请我去中央电视台一起做了《开讲啦》关于长江大保护的节目，节目做得也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在他们的



1980年，水生所的科研人员为淇淇治疗创伤，左起：刘仁俊、陈佩薰、林克杰

带领下，中央电视台1、3、5、13、15频道先后做了关于我研究工作的节目，我故乡的常州电视台还专门为我做了《走南闯北常州人》的特别电视节目，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根据水生所曹文宣院士的建议，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从2020年开始，长江将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息期。

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母亲河长江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将长江江豚的微笑永远留住。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在科学院的精心培养下，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我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小有名气的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仁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白鱔豚研究室主任）

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 吴至诚

初入科技情报队伍

我是1978年7月调入武汉市科技情报处调研室的。在此之前，曾长期在电子工业系统机关和工厂工作，1976年年初借调到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搞微波能、太阳能等能源新技术推广。在那里，我同情报处的卓香彬、廖翠兰、孙维元等同志有接触，所以，当时任市科委副主任的吴官正安排我到科技情报处工作时，我是非常高兴能当一名科技情报战线新兵的。

当时的科技情报处兼有政府业务管理和科技情报服务双重职能，设有情报网站管理、文献资料阅览和检索、外文翻译、科技参考编印、摄录像、印刷厂等部门。在陈明英副处长询问我的志向后，我如愿进入了新

成立的情报调研室，跟着老同志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记得卓香彬同志向我们介绍“产品生命周期”这一新名词时，习惯于计划经济环境的观念受到冲击，我体会到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才能当好科技情报人。我参加的第一个调研课题是“武汉市优先发展轻纺工业，以求资金积累”，学习采用“三个水平（国际、国内、本地）、两个差距（本地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相比较）”的模式分析问题，提出发展建议和措施，这虽有别于当时国家以“农、轻、重”为序发展产业的方针政策，却得到处里讨论通过和市领导好评。第二个课题说起来也是逆风而上的，是在武汉市有条件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建议，因为在口头汇报立题说明时，市科委肖望主任曾戏言“我这辈子也许是看不到武汉市能研发出计算机来的”，认为此举高不可攀。但调研报告

完成后，肖主任改变了看法，并且大力支持市无线电所研制出 DJS-130 型小型计算机，唱响了数字《东方红》乐曲，还支持市无线电二厂挂牌市计算机厂，鼓舞了科技人员勇攀高峰的志气，也奠定了武汉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基础。

学习认识高新技术和产业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甫一提出，大家体会并不深。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掀起以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等书籍为中心内容的新技术学习的高潮，情报处领导及时组织编印了多本小册子，举办各种讲座，向市分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宣讲，广为宣传，跟上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处里的同志也受到深刻教育。对于我个人而言，更乐于回到本专业，即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化，把科学技术落实到发展生产力上。

从此，除相对比较熟悉的无线通信、微波能（非通信领域）应用外，我更关注光纤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激光等新技术的动态信息，积极参与相关网站、学会的活动，编写和评议有关调研报告。

1984 年，我参加省科技情报所余宏义同志主编的《湖北省科技发展规划背景

材料》编撰工作，独立完成《湖北传感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微电子和计算机现状及发展趋向》等专题报告，使我对上述技术在湖北、武汉的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为今后推动其产业化打好基础。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我协助武汉建材学院物理系姜德生老师争取到省科委 15 万元的经费，使其光纤的非通信应用——光纤传感器实验室得到充实，其原理样机产品化，发展到后来成为国家级光纤传感器技术工业性试验基地，并由此建立了武汉理工光纤传感科技公司。后来，姜德生老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荣获 50 万元的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金。

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 17 年

1985 年 7 月 15 日，我随市科委鲁启汉副主任（同行的还有市咨询委办公室水世罔副主任）去北京参加国家科委曾宪林副主任



20 世纪 80 年代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合影，二排左一为吴至诚，二排左四为武汉市政府副市长郭友中

主持召开的“火炬计划”吹风会。自从阿尔文·托夫勒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掀起了高新技术发展热潮后，北京市以中科院为首，凭借地区科技优势，提出在海淀区构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区，希望国家拨巨款支持。各地闻风而动，国家科委受命抓这项工作，召集有较好条件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五市科委来研究如何做。武汉的方案是从项目做起，逐步形成新技术产业区，这种要政策、不要拨款的做法受到肯定。上海市在黑板上描述了在漕河泾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建新技术产业园，以企业化方式进行管理，但没有书面资料。天津、广州基本没方案。会上还交流和讨论了高新区的模式、条件、优惠政策和资金等问题，供国家科委进一步决策。至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行动即以“火炬计划”命名。这个计划与支持农业科技的“星火计划”并列，取意“星火燎原”。

不久，我就到市科委具体负责的东湖智力密集经济小区规划办公室工作，一起为完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而努力。



1989年3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应该说，这项工作省、市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直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在上报的《情报汇报》上常常看到省委吕乃强秘书长和市委王群书记的批示，王书记还曾亲自主持发展武汉计算机产业的研讨会，体现了省、市“共建共管、以市为主”的开发区初建时的领导体制。

市科委在邓南生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借调市咨询委水世闯、市自动化所孙光荣（后换胡学胜）、市化工局王富友和我组成东湖智力密集经济小区筹备组，该项工作开始有了专班。筹备组成立后，市委、市政府从武汉大学调来鄢祖林、刘家栋等同志，分别担任科委副主任和筹备组负责人。接着市政府批准成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鄢祖林兼主任，并由汉口迁到武昌现场办公，同时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这一增员举措在当时政府机关是首创。开发区下设产业发展处、企业管理处两大业务机构，全面开展规划修订、区划确定、优惠条例制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发展等基础工作。

1989年3月22日，作为开发区管理与决策的“外脑”——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成立。其组成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战略方面的，有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担任主任委员）、市科委主任邓南生（担任副主任委员）、省政府副秘书长汪定国、市委政研室主任胡国璋；另一类是专业专家型的，按新技术：光纤通信、激光、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六个领域分门别类邀请专家学者共17人，为当时的开发区指导委员会提供咨询，

为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当好顾问。我是秘书长，做具体工作，当时专家委员会拟订的工作思路是“收集信息、参加评议、提出建议、广交朋友”，这也成为开发区的一大特色。自运作以来，多次参与各种规划修编和评议，为领导决策提供许多有益的咨询参考意见。

“光谷”的提出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又一里程碑。1998年7月，原华中理工大学黄德修教授到台湾参加国际光电学会年会时，介绍了武汉东湖地区是国内最密集的兼有光电子学科教学、科研和生产企业的地区，堪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光学中心所在地 Tuscon 市的光谷媲美，是中国的光谷，引起全场震动。黄教授回来后曾向市科委刘家栋主任汇报过，后写成建议，专家委员会获得底稿后将全文复印，加上按语分送光电子有关部门和单位，以期引起共鸣，扩大影响。省科技情报所更据此刊载于《情报与决策》上，得到省、市领导高度重视，遂有许其贞等10余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光电子产业，建议在武汉建立“中国光谷”》的提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2001年获得科技部和国家计委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和开发区的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在开发区工作期间，我曾担任市政府通信产业及以后的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顾问。既是工作需要，又出于科技情报职业本能，我一直关注跟踪国内外信息技术领域的动向，其中之一，也是武汉的优势，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技术，称之为“3S”技术，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科院测地所等单位开展大地和空间精密测量，所用仪器都是绕过当时的“巴统”禁运，高价引进

的。1991年，我联系美籍华人程安煌先生引进民用GPS接收机，帮助省公安厅向公安部申报我国首个警车GPS跟踪调度系统研究立项获准，又帮助长航科研所开展GPS船舶导航和定位实验，还推动测地所与高压研究所合作研制快速定位输电线路雷击的装置和与邮科院合作开发SDH网络时间标准仪等应用项目。专家委员会还写评议书向国家科委力争在武汉建立国家GPS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起到一定作用。其间，写出文字材料20多份。由于武汉GPS技术力量在国内的优势，我曾被选为中国GPS技术应用协会仪器设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3S”关联到智能交通系统（ITS）和智能建筑（IA）等信息新技术，我曾写出多篇报告向领导介绍并获得好评，其中有些建议后来被纳入光谷产业发展规划。

2002年年初，我退休后离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还孜孜不倦于科技情报收集和反映。这些都源于自从进入科技情报队伍，受到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教育，我早已把它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任何环境下都会关注新的信息技术发展动态；而且，长期从事幕僚工作，并同院校、科研单位、企业联系密切，自然会向有关领导和单位反映，如能有点作用，也算是尽了绵薄之力了。

（吴至诚：武汉市科技情报中心原总工程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原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我和我的钢琴博物馆

◇ 贺立军

我的前半生

1976年，我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我8岁时，父亲所在煤矿大爆炸，他有幸躲过了一劫，煤矿关停后被安置去了湖北沙市，我们全家也从农村搬到了城市。由于母亲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我们被称作“半边户”，所以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没想到若干年后，我和弟弟先后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她成了我们全村人的骄傲。

我是典型的“教育改变人生”的受益者，所以深知教育的重要性。5岁时我就上小学了，因为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当时一所学校就只有一位民办教师，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思想品德课都是这个老师教，没有外语、美术和音乐课，因为老师不会。我的父亲英年早逝，他在我们兄弟俩小时候一

直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又红又专”。但我却和父亲不同，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做到德智体艺能全面发展。

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了我坚强、刚毅的个人品格。2001年，我就开始尝试在校创业，并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2010年，我成功地卖掉了公司的全部股份，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一直觉得国外的世界很精彩，很想出去闯荡一下，所以选择了矿业投资与咨询这个专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全家一起去了美国密苏里州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的第一架古董钢琴

我的女儿5岁就开始学习钢琴，在美国给她买钢琴时，我们无意中买到了一架古董钢琴。这是一台1912年的Behning&Son(贝宁)立式钢琴，她的主人正在网上着急出售，出售价格是300美元，并一再强调这台钢琴

棒极了，紫檀木琴身、象牙白键、乌木黑键，琴声浑厚优美。精美的工艺、细腻的音色让我一见倾心，我好奇地买下了这架钢琴，并联系了一家搬家公司，又花了400美元搬到家。钢琴主人送给我一张1914年购买这架钢琴时的原始收据，我清楚地看到当时这架钢琴的售价是425美元，要知道那个年代黄金价格是每盎司18美元，一个银行高管的月工资也才20美元。

为了对这架钢琴作进一步了解，我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同时，这次偶然的捡漏，让不懂音律的我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钢琴不仅仅是乐器之王，有着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同时还代表那个时代手工及工业制作的最高技艺和工艺，而且每架古董钢琴能留存于世，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值得回味与探究。

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外滩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举行婚礼，钱学森特地赠予蒋英一架钢琴。1966年，这架象征着科学与艺术美满交融的施坦威三角钢琴被钱学森图书馆永久收藏，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央音乐学院还联合举办了“艺术与科学的天籁之音——蒋英与钱学森事迹展览”。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激动地说：“父亲一直告诉我们：科学家需要艺术修养，艺术家需要科学思维，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综合创新。”

2000年，约翰·列侬生前使用过的钢琴通过网络向全球网友竞标，结果以208万美元

的天价售出。这架钢琴是1970年约翰·列侬花了1400多美元买的，一年后他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创作了那首举世闻名的歌曲《Imagine》。这架钢琴的实际价格与拍卖成交所得，竟相差了近1486倍，为流行歌手身后遗物拍卖金额写下新的纪录。

随着对古董钢琴的日渐痴迷，在美国工作之余，我几乎跑遍了美国本土48个州，收集了各类古董钢琴100余架。为了让这些古董钢琴发声，我开始自学钢琴结构原理及修复技术。

回国再创业，跨界钢琴博物馆

2014年，我决定全家回国，同时创建一家钢琴博物馆，为的是向社会分享自己收藏的钢琴，并更好地推广钢琴文化，传承与发展钢琴艺术。我用了20个集装箱把我所收藏的100架钢琴打包，漂洋过海从美国运回武汉，而后选择了在武汉市琴台文化艺术中心新建钢琴博物馆。这里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发源地，古琴台的琴声很



贺立军和他收藏的古董钢琴

美妙，故事更动人，知音故事之所以被中外世人所传颂，因为这里蕴含着知音难遇、相知可贵、闲情雅趣等典义。博物馆借助古琴台的知音文化底蕴而诞生，将会绽放出恒久的艺术魅力。

众所周知，博物馆具有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属性，行内闲谈间有些话，“要想早破产，就办博物馆”“办馆难运营更难”等等，说的就是开办一所博物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经营好一家博物馆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尽管困难重重，我仍然坚守初心，希望借助博物馆这个平台以琴会友，让藏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古董，而是文化、艺术交流的媒介。为了丰富藏品和展陈，我几乎每年都要去欧洲和美国参加各类拍卖会购买藏品，然后再想方设法运回武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董钢琴、提高钢琴艺术修养，我们举办了各种社教活动，如古董钢琴音乐会、知音钢琴生活节、钢琴读书会等等。为了让博物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努力拓展钢琴类相关文化产业，新建了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及全球古董钢琴修复技术中心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努力让钢琴博物馆走得更远。

对我个人来说，古董钢琴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收藏，所以我还一直致力于钢琴的全修复技术。该技术可以使一架古董钢琴恢复到出厂状态，既保留了原有的艺术性，又让手工钢琴黄金时代的音色完美再现。自2014年8月博物馆开办以来，已经修复了数十台古董钢琴，甚至许多欧美的收藏家也将钢琴送来修复，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创建琴台钢琴博物馆的7年间，我变卖了在美国的多处房产及所有的固定资产，而且把变卖所得全部投入了博物馆；我几乎

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将全部精力放在发展博物馆事业中。7年来，琴台钢琴博物馆从业人员从最初的1人增加为20人，藏品从最初的100台增加到1000台收藏级古董钢琴，规模也从最初的2500平方米发展为综合面积8000平方米。2020年12月，我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这是湖北省第一例非国有博物馆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博物馆。

蓦然回首，余生可期

我的人生已走过四十年有余，如果说人生十年一个小节，半生走来，懵懂少年十年，寒窗苦读十年，商海沉浮十年，而情迷钢琴又十年。为了自己收藏钢琴的情怀，这一路走来，所有的困难和艰辛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看到游客参观完博物馆感叹能看到如此多、如此好的古董钢琴时，我的心中总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已经达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境界了，用一颗包容的心面对生活，积极付出，未来将值得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国家文物局也出台了多个文件鼓励各级政府在博物馆场馆建设中大力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这些都让我们文博人感到博物馆的春天和发展新阶段已经到来。我们将朝着更高的目标，把博物馆新场馆建设好，为推动文化创新、繁荣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贺立军：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馆长）

回望武汉治政史上名芳千古者

◇ 郑巍宁

主政一地一城，因话语主导和资源掌控，极易塑造德政双馨、治效超群的能官贤吏形象。然而时间会洗去粉脂，让浮光彩绘归于本真，因而城市史上主政者能青史留名的不是太多。武汉从东汉末年黄祖建却月城、孙权筑夏口城，至今近 2000 年的治城史上，主政官吏无数，而政声人去后仍被点赞的不多，尤能经年仍名逾天下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正是这些名垂青史的能官干吏，如夜空明星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烁，泽润出城市形象与声色亮度，成为了城市的重要资源和历史名片。人去千年听政声，可感触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响，也可探寻为官治政的古今要道。

千古留芳的能官大吏

武汉自南朝刘宋分荆置郢成为郢州治所，迄今主政的州级以上官吏超过千人，其中政声卓著的代表当首推南梁萧秀、唐朝牛

增儒、南宋岳飞、晚清张之洞四人，他们对武汉贡献巨大，赢得了跨越古今的赞誉。

贤良刺史萧秀。公元 518 年的一天，寒风掠过郢州城头，五色旌旗猎猎飘扬。城南门西去的道边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群，这是郢州百姓自发为他们的刺史萧秀送行。萧秀新任雍州刺史，这天是启程西去的日子。萧秀任郢州刺史前，齐梁嬗代，萧衍起兵与南齐军队在郢城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攻防战，终于攻下这一战略要地，顺势挥师建康（今江苏南京），灭齐建梁。但郢城几近废墟，积尸遍地，10 万人口十之七八死于战乱和瘟疫，百姓“皆积尸床下，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南梁首任郢州刺史曹景宗战场勇猛，生性贪婪，在城南起宅列街，鬻货敛财。部属残暴，郢城雪上加霜，民众苦不堪言。至萧秀任郢州刺史时仍有围城死者“不及藏殡”，黄鹤楼下遗有大量“露骸积骨”。萧秀祭而埋之。百姓贫寒，萧秀夏设粥舍，冬制寒衣，赐冻馁者。妇女迫于生计

卖身供奴役者，予以救之。州衙极为简陋，萧秀务存约己，节衣缩食，减免征收。短短四年“百姓安堵，境内晏然”，萧秀却疾病缠身。此时其兄梁武帝萧衍令其西去，是委以大用还是忌其贤能且坐镇中流尾大不掉，这历史迷雾无法说清。那天郢州民众自发前来送行表达了对百年难遇好官的不舍。萧秀因病死于西去途中，郢州百姓闻之纷纷“裂裳为白帽，哀哭以送之”。这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与礼遇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萧秀治郢乃郢城之幸，百姓之福。

干练督军牛增儒。公元825年，唐朝著名的政治家牛增儒以检校礼部尚书、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身份坐镇江夏。牛增儒镇江夏六年对鄂州行政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以大江南北分设鄂州、沔州是“虚张吏员”的弊政，奏请合二为一并获朝准。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大江两岸的武汉在一个行政建制下管辖，顺应了城市治理的一体化要求，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了思路和时空场景。牛增儒以陶砖结构替代土夯结构新筑鄂州城垣，既避免了每遇江风尘土飞扬、城墙毁损，又减少了地方官员以城墙修缮之名横征暴敛，革去了一大弊政。牛增儒以武昌军节度使身份坐镇江夏，使武昌这一颇具历史文化内涵的名称西移并取代江夏称谓。牛增儒革固鼎新的治政新风给武汉发展带来了新鲜活力，为武汉在唐宋时期的繁荣注入了源头活水。牛增儒以及诗人元稹等著名政治大家、文化名家先后坐镇江夏，彰显了名人效应，提升了城市美誉度和吸引力，武汉一时成为文人墨客、商贾游民的打卡胜地。

忠勇将军岳飞。1133年，岳飞以江南西路舒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身份，率大军进驻武昌，以图收复襄阳进取中原雪靖康之

耻。自此以后，其大本营驻武昌长达7年。岳飞对武汉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一是岳飞移师武昌遏制了南宋战场颓势，阻止了金兵南下，避免了武汉再次遭战争屠城，且迅速收复钟祥、襄阳、邓州等重镇，保护了一方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岳飞治军极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军行之处秋毫无犯，最大限度减少了民众负担和兵患伤害。三是岳飞力行军民屯田营田，鼓励垦荒种植，大量吸收北方战乱流民定居并从事农商业，有效稳定了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的维持性发展。四是岳飞精神成为武汉城市的宝贵财富。他精忠报国、收拾旧山河的忠勇气概，他秉持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清正廉洁的德政风范，他的民族气节和文韬武略，他孝敬尊长、爱民如伤、体恤兵士、严律子女的仁心孝风，深深嵌入城市历史文化血脉之中，激励武汉成为一座有血性担当、能拼搏进取、敢创新求变的英雄之城。他，已成为武汉人的精神楷模。千年后的今天，岳飞亭、岳飞铜像、岳松、岳庙等纪念遗址，仍是武汉人追思缅怀、教育洗礼的去处，激励来者在城市崛起、民族复兴征程中永不懈怠、奋勇前行。

超能总督张之洞。武汉近现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对武汉的贡献举足轻重。张之洞在武汉开埠近30年后督鄂，其系列新政加快了旧武汉向新都市的转型。他提出并组织京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建设，组建轮船公司，构筑起现代交通体系，形成“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他主持兴建汉冶萍钢铁公司、汉阳兵工厂、丝麻纺织局及众多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构建起近现代工业体系，使武汉成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经济强市。他组织商务局、商会，举办博览会、交易会，扩大内外贸，使武汉

成为商贸重镇，被誉为“东方芝加哥”。他改革市政、发展教育、训练新军……系列新政不仅有力提升了武汉经济政治实力，而且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使武汉引领潮流、标新时代，把武汉在中国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历史河流大浪淘沙，能青史留名并在民众心中刻下丰碑者乃是千淘万漉后的金子。岁月的风霜无损其光泽，时空的切换只会使其更加闪亮。萧牛岳张无疑是武汉政治史中耀眼的真金，在历史长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高洁过人的官德操守

政声誉千古、功德耀长空的能官大吏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境遇各异，但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官德操守。

高远的人生志向。成大事者必有大志向，大志向才有大格局，大格局才能大作为。萧牛岳张，他们多是处于时代维艰、国家危难之际，都有天下已任的家国情怀。萧秀“敦厚朴实，存河清海晏之志”。牛增儒目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草木惊心之状，青年时就怀“振朝纲匡社稷”的抱负。岳飞“沉厚寡言，常负气节”，有“收拾旧山河”的宏图。张之洞怀维新救国、洋务兴邦之梦想。正是这些人生大志使他们能够越过古往今来为官从政的重重障碍，跳出威逼利诱陷阱，真正做到威武不屈、功利不惑、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高光的政治操守。主政一方的政要大吏，都有自己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操守，其差别在于是高光还是隐晦。萧牛岳张均有政治主张鲜明、政治操守坚定的特点。牛增儒为唐朝宰相、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牛李党

争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历史早有定论，在此不做赘述。但牛增儒为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执法不阿，是清流领袖。岳飞作为主战派代表人物，立场鲜明坚定，不妥协、不退让、不放弃。面对主和派得势，两次拒辞高官厚禄，直至冤死狱中。张之洞迫于压力政治上相对圆滑，但维新的政治立场、实业兴国的政治主张始终未变且终身力行。坚定的政治立场、光明磊落的政治操守是为官从政的基本品质，是古今识人辨人用人的重要尺度。

高洁的道德风范。道引乾坤，德行天下。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道德品行是为官治政的第一形象，不贪不色君子底色，身正方能行端。萧秀西行随身所带仅“书竹典籍”。牛增儒因拒宣武节度使韩弘贿赂而得朝廷器重。岳飞驻鄂，蜀帅吴玠送名姝宝玉、资奁百万抵达汉阳，岳飞得知立即修书辞退。岳飞死时家无余资，“秦桧犹疑，尽捕家吏刑逼而不得镋铖。”张之洞封疆大吏，权倾朝野，在位几十年而家田未增一亩。无私欲方可尽忠报国，有敬畏才能竭诚为民。

高博的学识才干。有才无德不能大任，有德无才难堪大任。萧牛岳张均受过严格教育，是敏慧博学、识见超群的栋梁之材。萧秀少有文名，所著《类苑》尚未刊印即已流传。牛增儒的《玄怪录》时人争传，一时纸贵。岳复工书善词，文才卓越，一首《满江红》更是千古雄文，尽显酣畅淋漓的豪壮之美。张之洞的《劝学篇》阐述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成为当时青年才俊之圭臬。学识才干既源于严格的教育启迪、清正家风的熏染传承，也赖于实践磨砺、艰辛历练。主政官员既要看其教育学历、策论见识，更要看其实践经历、决断能力。胸有大志、腹有经纶、

干有力道者方可委以重任。实干兴邦乃古今不易之理。

高勇的个性风骨。个性鲜明,勇于担当,有血性,敢赴难,是萧牛岳张的又一相同特征。萧秀抱病西行,助新基开创。牛增儒屡谏屡伤,挽朝纲再振。岳飞生死赴战,扶大厦将倾。张之洞励精图治,求国家强盛。艰难励心志,危亡造英才。当官治政勇于担当,拼搏作为,求新求变,敢开新河,决断赏罚,雷厉风行,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吃常人所不能吃之苦,才能造常人所不能造之业,成常人所不能成之功。

宽松的环境与难得的机遇

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能否有大作为,既取决于个人志向操守和才干作为,也取决于时代背景和政治生态。萧牛岳张名垂青史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特殊背景下成就的伟业。

宽松的治政环境。萧牛岳张都是在国家民族或政权危难时刻出镇武汉,危难之际治政环境往往宽松。萧秀治郢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时期,群雄逐鹿,山河动荡,危机四伏。牛增儒镇江夏时值晚唐,李氏政权已是强弩之末,气数渐衰。岳飞驻鄂,南宋政权岌岌可危,正是生死煎熬之际。张之洞在列强凌辱、民族危亡时刻督政湖广。危难时期,朝廷对地方治政戒律较少,依赖与希望较大,信任度相对要高。同时因有危机,朝廷与地方都少了身心懈怠,多了求新求变;少了繁文缛节,多了真抓实干。因此地方官员的政治主张、个性风骨、智识才能均能得到最大限度施展,治效自然显著。这正是危难兴邦之因由。

难得的历史机遇。萧牛岳张能在武汉

留下享誉古今的政声,都有难得的机遇因素。萧秀所处南朝倚重江南,长江沿线是其重要生命通道。武汉于上游有藩篱之要,于下游为扼制之津,向为朝廷战略重镇。南宋将郢州治所放在江夏,彰显了武汉的战略价值,萧秀治郢州所拥有的资源权力自然不同一般。牛增儒镇江夏时,乃安史之乱后淮河阻隔,漕运转为长江,大量粮油盐铁经江夏走荆江、汉江北上,尔后陆路转运长安。武汉对朝廷举足轻重。这样的历史机遇使牛增儒镇江夏有一般节度使所没有的治权。张之洞督鄂治效超群,得益于武汉开埠后的历史机遇。当然机遇常有,抓住机遇并赢得机遇者并不常有。但没有机遇,即便拥有雄才大略也往往会留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历史遗憾。

开明的政治生态。历史常常充满悖论,危难之际治政环境反而宽松,朝廷弱势,政治生态则相对开明。牛李党争持续四十年,政治生态足够开明、包容与多元,但与君王走马灯、皇帝昏聩不无关系。南宋主战、主和两派势如水火,皇帝首尾两顾、左右摇摆,足见其昏庸无能。上过睿智下无干吏,中央强大地少能官。开明的政治生态往往能成就地方官员的功名伟业,但残酷的政治生态难以期遇且又不可持续。治政现实从来不兼容浪漫思维。中央强权往往意味国家强大,地方强势往往潜藏分治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千年政声也给了我们深层的思考与启迪。

(郑巍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四级调研员)

武昌后长街往事

◇ 陈德刚

家住后长街

武昌后长街位于解放路的前身“长街”之后，故而得名，是一条历史比较悠久的历史，长约千米，南起读书院，北止蛇山南麓，四通八达，生活便利，闹中取静，得天独厚。

我家在后长街中段，房子是爷爷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买的，50 年代初经过维修改建成砖木混合结构的平房，占地 400 平方米，有一个大堂屋，5 间正房，2 间偏房，2 间厨房；房子的上下梁以及立柱都是粗大的杉木，房间两面是空心砖墙，两面是杉木板，地上铺的是地板；前后院子约 150 平方米，前院有两棵低矮茂密的无花果树、一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一棵槐树、一棵柳树和一些观赏性植物，如箭竹、菊花、牵牛花、月季花等；后院有一棵老桑树、一棵槐树、一棵没结过果的木瓜树和一片芍药花。春

天，青涩的桑枣和柳芽给小院带来春的信息；夏天，在浓密的树阴下躲避似火的骄阳；秋天，金黄色的梧桐籽和鲜红的无花果飘出成熟的诱人香味；冬天，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雪压屋檐下的“冰激凌”。在与邻居相接的院墙处，嵌着一块斑驳的大青石，上面写着“墙界”二字。

后长街有三个出口通往解放路，一个通往彭刘杨路。解放路和彭刘杨路上有往来于武昌城和郊区的公共汽车，汉阳门江边有到汉口的过江轮渡，大桥上还有连接武昌水果湖和汉口六渡桥的电车。买菜，到大成路和杏花天菜场；买食品，有曹祥泰综合副食店和千玉副食店；买百货，到武昌百货公司和维新百货；看电影，有武昌、江汉、黄鹤楼、人民、群众、湖北等影剧院；上餐馆，到大中华、雅园、同兴、生香等酒楼，特别是大中华的烧梅和清蒸武昌鱼，雅园的炸蚕丝饼和原汤面，同兴的热干面、炸油香和糊

米酒，想起来都嘴边留香；还有永康绸布店、刘有余大药房、儿童商店和新华书店，等等。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大人给2元钱，我就到武昌百货公司旁边的回民餐馆端几个菜，回锅牛肉3角、烧牛脯4角、牛肉圆子5角；屋里再炸上一盘香喷喷的花生米，就是相当不错的下酒菜了。

后长街像大家庭中的长哥长嫂，身后还拖着一群老弟妹，如扎珠前街、扎珠中街、扎珠后街、后宰门、先贤街、八卦井街、九龙井街，等等。老人们讲，明朝时这一带都是楚王府，先后有九代楚王住在这里，如扎珠街是为王府扎制珠冠的地方，后来分成扎珠前街、中街和后街；先贤街得名于很多仁人志士居住过；有王府人员饮过水的水井所在地则取名为八卦井街和九龙井街。从小我就经常在这些街巷中穿行和玩耍，那时没有水泥路，即使柏油路都很少，大多是写满斑驳历史的青石板路和碎石路。

最有烟火味的要数后宰门了。后宰门旧称厚载门，相传为楚王府的后宫，是候补官员出入办事的地方。解放前就是商贾之地，是众多街巷中的街中之街，长约500米，宽约4~5米，有剃头铺、杂货铺、铁匠铺、白铁铺、豆腐铺、小吃店、绸布店、棺材铺，等等，主要是些世代相传的家族生意和以手工业为主的小本买卖。这些店铺的门面很多都是一扇扇厚重的木门拼接起来，每扇门上有编号，如果有一扇装错，晚上门就关不上了。来这里买货的都是周围四街八巷的乡民，也有从其他地方专程赶来的，有些东西只有在这些老街中才能买得到。如果遇上连绵的阴雨天，你会看到攒动的路人，有的撑着黄褐色油布伞，有的戴着竹篾和油纸编成的斗笠，有的穿着棕榈蓑衣，还有提竹篮的、推自行车的、拉着小板车和小轴承车

的，在参差不齐的低矮门面旁和油亮光滑的青石板上蹒跚着，和着铁匠铺的铿锵声、白铁铺的叮当声、小吃店和豆腐铺的吆喝声，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图。

买水吃

那时的居民区，自来水管都是几家共用或者到公用水管买水吃，能够一家独用的几乎没有。

离我们家不远的扎珠中街街口有一个专门卖水的公用水管。这个水管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开关在专用的小屋内，有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负责操作，女人长得比较胖，街坊都叫她“胖嫂”。胖嫂住在扎珠中街，因为家里伢多，生活比较困难。她文化程度低，没有工作，所以居委会就照顾她管水，每个月有20多元钱的收入，白天、晚上随叫随到，蛮辛苦。胖嫂勤快，近2平方米的小屋打理得蛮干净，里面有个装工具等杂物的小柜子和一把旧靠背木椅。

公用水管的管径比家用粗好几倍，一个大木桶几秒钟就装满了，难怪有些几家共用水管的住户有时也愿意买水吃。到了星期天，特别是阳光明媚的时候，洗大件衣被的婆婆妈妈们在公用水管旁扎了堆，有赤脚踩被子的，有用棒槌敲打的，她们高兴得边洗边谈天，当然也少不了为用水和占地盘起争执……这个时候，胖嫂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调解矛盾，这也是她最高兴和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买水凭牌子供应，1角钱10个竹牌子，一个竹牌子可以买一桶水。如果要人挑水送上门，一担水2个竹牌子，另外给挑水工5分钱工钱。挑水工可以为周围居民送水，也可以提供其他方面的有偿劳力服务。我们附

近有一个叫“四哥”的中年挑水工，听说他家上几代都比较殷实，到他父亲时就破落得只剩下房产了。四哥小时候发烧无钱医治，落下了有些耳背的毛病，以至说话结巴，但他为人善良，肯出力，整天乐呵呵的。街坊都蛮喜欢他，除了送水外，有些老人遇到力所不及的事都喜欢请他帮忙。每天中、晚饭时间和星期天都是用水的高峰，也是他最忙的时候。有一次晚饭时，我们家的水管突然坏了，一下子又找不到人来抢修，急等用水的邻居有的晚上要开会，有的要上夜班，有的家里孩子多的，还等着饭吃。老人要我快去找四哥，要他赶紧给我们送两担水来救个急。那天，四哥正在家服侍年老体弱又突然患病的老娘，一天都没出门，蛮为难。他老娘说：“快去救个急，难为街坊们看得起。”那时我10来岁，体会不到四哥老娘的心意，现在想起来，感到四哥是个好人，四哥的老娘也是个好人！

那年的正月十五，居委会在文化室组织了一次文娱晚会，管水的胖嫂和三个挑水的男将合说了个三句半，四哥说的最后半句。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段子，是“冬天送水冷得惨，夏天送水热得喊，街坊邻居夸我们……”四哥一激动，说话越发结巴了，憋了半天，终于爆出几个字：“好、好、好汉！”乐得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爷们一起喊到：“嘿，好汉！”

粮店、煤店和柴禾店

计划经济年代，一些紧缺性的商品，从吃的到用的，都是凭票供应。我接触比较多的，是买米、油、煤和柴禾，每家都有购粮证、购煤证和购柴证，每本购粮证每个月还可以买一点计划面粉。

居民区的定点粮店先在后长街中段火巷旁边的老地板房，面积比较小，人一多就都站到了街上，后来搬到扎珠中街，有100多平方米，空间很高，水泥地。除卖米面外，也卖油，有2台手控漏斗式售米机和2台压力式售油机。原先卖米全是人工操作，费力又费时，后来售米机上装了个盛米的大漏斗，人工操作让大米从漏斗流进售米机中，实现了半机械化。平时，只有1角3分7的大米和一般成色的面粉、棉油和菜油；过年过节，可以按计划购买1角4分2的大米和比较白的面粉以及计划香油。有一段时期，大米比较紧张，每个人的定额都要搭配相当的面粉。南方人从吃惯了大米到部分以面食为主食，刚开始有些不习惯。我们家人多，有时肚子还没有饱，但面粉有剩余的，家里人借鉴了街坊邻居一些面食的做法，如擀面条、蒸包子馒头、蒸饺子或煮饺子等，花样多了，面食也变得好吃起来。虽然包子馅和饺子馅都是素菜，但在我们家总是抢手货。

煤店在读书院，属于厂店一体化的形式，早先是履带式煤球机，后来改成履带式蜂窝煤机，粉尘非常大，工人蛮辛苦。由于产量很低，边做边卖，遇到卖完了，还得预约或者下次早点去。所以，家里破碎的煤屑是一定不能浪费的，经水调和捏成煤球再用，是那时每个小孩家务劳动的必修课。每天早上老人都会把炉子里没有烧透的煤屑收集起来，作为二次使用。如果煤和煤票都用完了，只有到私人煤店买点溢价煤或找邻居借一点，下个月再还。我们家前面有个私人煤店，老板姓夏，性格蛮内向，整天就知道干活，与人沟通主要靠妻子，街坊称他们为“夏家的”。夫妻俩蛮和气，他们不仅煤做得好，从不短斤少两，还送货上门，用自己辛劳的双手养育着五个小孩。

柴禾店在乾福巷，离煤店不远，长木头搭成的围墙和门，蛮有特色，像个山寨。点燃煤炉，要先放干柴禾，再从炉膛下面用纸将柴点燃，最后在燃柴上放煤，我们管这个过程叫“生火”，也称“生炉子”，所以柴禾是烧煤年代不可缺少的。柴禾店供应的柴禾一般有两种，一种贵些，是加工好了的，回去可以直接用；一种便宜些，回去自己再加工。

玩耍和街头小吃

春天放风筝，夏天游泳，冬天玩雪撬，还有打珠子、玩洋画、跳八关、跳房子、滚铁环和打陀螺，等等，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

玩得最多、最普遍、最受男孩子欢迎的要数打珠子。将直径约2厘米大的透明玻璃球，用大拇指和食指将其钳住，贴在地面上进行弹射，我们将这种玻璃球叫“珠子”。不要任何设施，只要有珠子，春夏秋冬、室内室外都可以玩。一般用右手把玩，也鲜有左手把玩的，称为“左撇子”。玩得最普遍的套路是点发出去后，谁远谁先击打，这种玩法简单易行，大家都知道、都喜欢。输赢筹码有珠子、洋画、烟盒纸等。一颗有色的花珠子要抵好几颗无色的白珠子，崭新的花珠子值得还要多；洋画是两寸大小的彩色硬壳纸，印制得比较精致，上面都是很生动的古典人物，蛮受小伢们追捧；烟盒纸有大公鸡、圆球、游泳、大桥、黄鹤楼、黄金叶等牌子，大人抽完了烟，烟盒就归伢们，拆开了就成了烟盒纸，还可以到处收集。记得当年的玩伴中有一个小名叫“五毛”的街坊，他什么都玩得蛮精，珠子打得特别的好，往往是一颗珠子的本钱，甚至找别人借个珠

子，就可以赢得满载而归。反过来，他又将赢的珠子卖给你，或者先赊给你，赚一点吃零食和贴补家用的小钱。

跳八关是让一个人不断地做出蹲着、弯腰、一直到环抱颈部低头站立的八个动作，其他人则从他身上跨越过去的游戏。谁蹲谁跳要通过划拳来决定，跳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没有跳过去，这个人就要与蹲桩人互换角色。跳房子是在土质或者水泥地上画出封闭式的图形，玩者通过将比较平整的石片扔到所规定的图形中，再单脚跳进去将它按规定逐格踢出来的升级过程。跳八关男孩玩得多，跳房子女孩比较喜欢。

小时候，街头巷尾总是有卖小吃的挑子，麦芽糖、绞糖、转糖、棉花糖、炸年糕、蒸糕、炸藕圆子和臭豆腐，还有卖荸荠串的，等等。

卖麦芽糖的挑子走街串巷，不是叫卖，而是拿着他们敲糖块专用的一对小金属工具，边走边让它们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有时也喊：“敲糖了！”小伢们只要听见街上传来这些声音，就纷纷拿出家里的空牙膏壳子或各种各样的小铜器来换糖吃。麦芽糖由麦芽与淀粉制成，老板用专门的工具从大块上敲出小块下来。一个空牙膏壳子按两分钱算，小铜器由老板定价，也有用钱买的。那时小孩子手上能有现钱的很少，一般都是用牙膏壳子或者容易变现的东西来换。胆子大的，不惜将家里还可以用些天的牙膏当空壳子换掉；还有的把家中老式木箱子上的铜扣件和门上的铜锁都撬下来，为求得换糖时那种乐趣和解馋。

炸年糕不是过年时才有，平时也有，是用小铁铲在炭火炉上的平锅中翻炸年糕。年糕都是些小人和小动物的形状，有白色的，也有花色的，老板既收现钱，也收可以

变现的东西。小孩子都喜欢炸年糕，因为不仅过程蛮好玩，而且不想玩了又可以吃掉。特别是在积雪的冬天，伙伴们围在小火炉边，自己动手，有一种过家家的温暖感觉。老板用小刷子或小布团，沾上一点食油往平锅上满满地一刷，一股油烟透出的阵阵香味和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在冷峻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还有一种夏天的时令小吃——煮荸荠。就是把荸荠洗干净，不削皮，用竹签子串起来，一般8个一串，泡在清水里煮熟就可以卖了。荸荠串好像卖8分钱还是1角钱，吃起来脆脆的，还蛮饱肚子；煮过荸荠的茶色水2分钱一杯，喝到口里甜滋滋的，又解渴、又润肺、又健胃。有的挑子，一边是容器中的荸荠串，一边是小炭火炉，再挂上几个喝水的小铁杯，既可以在大街上摆摊，也可以走街串巷。我蛮喜欢这种风味，总是在放学后光顾，时间一长，老板跟我都熟了，看见我来了，就问：“是来串荸荠，还是喝杯水？”钱够了就买串荸荠，钱不够就买杯荸荠水喝，当然，有时钱不够，与同学搭伙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查火

我在黄鹤楼小学读四年级时，语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题目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为了写好这篇作文，我跟随八爷爷去查了一次火。解放前，称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为“爷爷”。我爷爷兄弟姊妹八个，八爷爷排行老八。

查火，在当时是提前警惕和杜绝火情事故的方式，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关心的过程。一般都在晚饭后，由所在居民小组轮流当值的住户，手持写有“查火”二字

的木牌，到每家每户检查、关照用火的情况。

八爷爷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心里蛮有数，记性非常好，哪家有几口人，为人怎么样，烧什么样的炉子，用火安全意识强不强，等等，一清二楚。那时房源很少，团结户蛮多；新房子很少，旧房子蛮多；两层楼以上的很少，平房蛮多。家用炉子一般有四种，第一种是像桌子似的架子炉，炉子中间是烧煤的火口，两边有2个盛水的铁质锥形容器，也有的只有1个；第二种是没有铁质容器的架子炉；第三种是空油桶改装成的铁炉，这种炉子体积大，火力足，适合人多的家庭；第四种是有提手的小炉子，用这种炉子的多为家中无老人的双职工或者家中人少的家庭，特点是灵活方便又比较安全。武汉的老居民有当天炉子不用后，把火种留着，第二天再用的习惯，称为“封火”或者“封炉子”。八爷爷查火总是先与别人聊几句天，然后再到厨房看看炉火，留心检查炉子封得安不安全，对团结户和空油桶改装的炉子查得特别仔细。

居民组内，有一个耄耋之年独居一室的翁婆婆，丈夫是搬运工，痨病死得早，膝下又无子女，政府把她按五保户对待。我们到她家时，门虚掩着，婆婆正坐在床上洗脚，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见婆婆的脚盆是一个高脚痰盂，后来听八爷爷讲，婆婆的小脚是从小当童养媳时缠成的。爹爹死后，婆婆靠政府补助金生活，每天只吃两顿素餐，晚饭后烧一壶水就把炉子封了。旧水泥地的小屋收拾得蛮干净，没有厨房，一个手提式小炉子安安静静地站在墙角里。婆婆家平时难得有人来，看见八爷爷带着孙子来查火，连忙把脚擦干，颤颤巍巍地在床头摸出两个小苹果塞给我，说是“前个把月过节时居委会送来的”。苹果虽然已经干缩了，但仍然透出

一股淡淡的清香。我怀着过意不去的心情，从婆婆手上接过小苹果，看到婆婆满是皱纹的脸笑得像个孩子一样灿烂。

跟随八爷爷查火，让我认识了一些邻居街坊，看到居民小组就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充满了爱。事后，语文老师在我写的作文后面留下蛮好的评语，还在班上进行了讲评，这也是我上小学后第一次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在院子纳凉和睡通宵

武汉的夏天像个大火炉，那个时候电视和电风扇都少见，更别提空调了。到了晚上，大街小巷摆满了竹床，男女老少都手摇芭蕉扇在外纳凉和睡通宵，当时民间流传一个段子，叫做：“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

我们家有两个院子，小时候过夏天，都在院子里纳凉和睡通宵，避免了每天下班后到街上抢占位置之烦。我们和姨奶奶、二嬢嬢家在前院纳凉，奶奶与小嬢嬢一家，还有八爷爷在后院纳凉。白天骄阳似火，尽管院子里有高大的树木遮阳，但地表温度仍然很高，特别是三伏天，地表在强烈的阳光下炙烤，有的还从裂开的地缝里往外冒着白烟。在摆放竹床前一定要先用很多凉水把地表温度降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节橡皮管套在水管子上，射程远，既给院子降了温，又为院子里的花草浇了水。

躺在竹床上数天上的星星和听大人讲故事，是我们在院子纳凉时的主要娱乐节目。密密麻麻的星星，总是数不清，用繁星似锦或者星空灿烂来形容那时的夜空，一点都不为过。有时看到沉甸甸的星星离地太近，好多次总幻想着用长些的梯子摘它几颗下来就

好了。老人们故事蛮多，有才子佳人的，也有神仙小鬼的，讲得多的还是穷人的故事。

如《窦娥冤》里，窦娥被刽子手砍下头颅的刹那间，六月的苍天为窦娥的冤情下起了满天的鹅毛大雪。后来，我还随老人到鼓楼洞的武昌区委礼堂看了京戏《窦娥冤》，六月飞雪下冤死的窦娥穿着一身素服鸣不平的场景，至今都记得蛮清楚。老人还告诉我，“天上的星星中，最亮的是北斗星。”“拖着尾巴飞跑的是彗星，那是天上的仙女下凡见牛郎来了。”在满天星辰中寻找最亮最大的北斗星和猜想又是哪个仙女到人间来了，这美好的遐想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盛夏的夜晚。

后半夜，暑气逐渐消退，院子变得比较凉爽起来，就是老话说的“下露水了”，为了防止着凉，人们都会先后把竹床搬回房间或者搬到堂屋去睡，否则，天亮时竹床上会有很重的露水。我很贪凉，总想赖在院子里睡通宵，但平时听多了鬼神的故事，一个人继续睡在院子里不免会有些害怕，就约了一位街坊到院子里一起睡通宵。街坊在三十一中读书，我们年龄差不多，是比较要好的娃娃友。他憨厚本分，身体壮实，喜欢用自制的石头担子来练举重和玩点小武功。特别是暑假，我们在院子里，有时聊些彼此学校的事情，有时向他学几个武功招式，有时我们一起采摘裂开口的无花果，有时约好白天到东湖或者长江边去游泳，感觉很投机，蛮高兴。

过年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最有年味的是年前采买准备，最难忘的是三十夜的团圆饭。

计划经济时物资需要凭票供应，而过

年前的物资专供票，如猪肉票、鱼票、活鸡票、鸡蛋票、干黑木耳和黄花票、小麻油票、糯米票、糍巴票、熟花生票，还有京果、杂糖、酥糖、糖果票，等等，加上平时的各种供应票，叫人眼花缭乱。为此，有人把各种票证集中印在一张纸上，2分钱一张，让人一目了然。

过年前，学校都放了寒假，每家每户采买过年物资的任务大多落在了孩子们身上。春节计划物资是特供商品，一般在节前都能买到，就是要多打探、多站队，曹祥泰副食、大成路菜场、扎珠中街粮店是我们采买年货的主要地方。

一旦到了计划物资，立马有人在街上拉起了号子：“哎，糍粑、糯米到了哇！”“哎，花生来了！”……信息马上通过在街上玩的伢们，在街坊邻居中传开来。一会儿功夫，粮店门口排起长龙，都是拿着布袋和篮子的伢们，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为了防霉防潮，年货买回家，八爷爷都把糍粑捂进大米里，食用前用冷水泡一天或半天，菜刀才能切得动；糯米装进小坛子；花生密封装起来。

我们家会在冬至后腌制一点腊肉和腊鱼，作为过年前后餐桌上的时令菜，有时还会腌制一点腊鸡和腊鸭。

年货采买准备差不多了，每家每户就要在年三十的前几天，为除夕夜的团圆饭和过年的菜肴作准备了。主要把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后几天要用的菜都做成半成品，到时候直接烩炒就行了。一般会准备些卤五花肉和鸡蛋、炸肉圆子、炸鱼块、煨鸡汤和莲藕排骨汤、炸翻散和麻花，等等。我们家八爷爷炸的肉圆子，个头小、颜色老，外焦内嫩，香甜可口，吃起来蛮有嚼劲，我总是先尝一个不想走，说好话再要一个，最后还会“偷”一个。

三十晚上的团圆饭是过年的重头戏，上桌前，父亲一定要在院子里炸一挂鞭，表示辞旧迎新。全家八口人，八爷爷、父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只有那天才都坐到一张桌子上。菜自然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有黑木耳烧肉圆子、红烧全鱼、萝卜煨鸡汤、莲藕排骨汤、蒸夹干肉和烘鱼腊肉，以及一盘卤鸡蛋和一盘油黄色的咸鸭蛋，有时还会有比较正宗的洪山菜苔炒腊肉。

特别是八爷爷做的夹干肉，那才叫一绝。她把五香干子、榨菜和卤熟的五花肉，切片交错叠放在大碗中蒸透后，反扣在大盘子或者大碗中成半圆形，再浇上热热的卤水汁，晶莹剔透，香气诱人，肥而不腻，吃起来香甜嫩爽，真是可口啊！

（陈德刚：湖北省总工会退休干部）

汉阳古城旧事

◇ 胡德彰

20 世纪 50 年代，武汉长江大桥和江汉公路桥、铁路桥的建成，让武昌、汉口、汉阳连为一体。在此之前，汉口已经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商业巨镇，武昌是历代省城、省会所在地，相比之下唯独汉阳仍然是古旧县城一座。三镇合一，也是武汉大发展、大建设之时，原本古老破旧的汉阳变化显著，用“沧海桑田”不足以形容她的变化，而应是“日新月异，仿佛瞬然换了人间”。

汉阳旧事、旧貌究竟何等模样？由于发展迅速，容易使人遗忘她的往岁，故某些叙述汉阳历史和人文地理的文章，有以传说替代历史真实的倾向。这里笔者试讨论之，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教正。

钟家村——子期结庐

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最早见于公元前 450 ~ 375 年道家重要

传承人“冲虚真人”列子的著作《汤问》。到明朝末年，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冯梦龙（1571 ~ 1645 年）的《警世通言》首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让知音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于是，全国多地都有所谓钟子期的结庐处和墓地。除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子期结庐处外，蔡甸区马鞍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青郢村等地也有俞伯牙摔琴处和钟子期墓冢。

我是武汉解放后首批接管汉阳区的干部之一，分配到福城区政府。当年的福城区是郊区，在区委书记邹德平、区长芦寿彰的领导下，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进行农村调查，走访农户农民。从汉水边到升官渡、鲤鱼洲，从邓家岭到仙女山、汤家山，乡亲们给我们介绍乡情，开口就是一句话：“三山六水一分田。”

古时候，我们的先民就是在水流弯曲的陆地和伸向水中的平陆嘴上繁衍生息的，

所以他们的聚居地叫作“湾”或“嘴”，古代湖乡人们的聚居地是不叫“村”的。摊开1912年《江夏（东乡）汉阳（南乡）地图》，图上数百“湾”和“嘴”，而不见一个“村”。

我们在《武汉历史地图集》（史火明主编）中查阅到1934年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编制出版的《汉阳街市图》，发现有一处标注“钟家村”的位置。撰写此文前，我也曾专程到湖北省档案馆查看原件。

我们又查阅了1909年的《汉阳府城附近最新图》（绘印者：徐秉书，中国地图出版社收藏）以及1909年的《汉阳府城及附近详图》（陆军特别小学堂出版，武汉市图书馆收藏），在《汉阳街市图》上近似“钟家村”的地理位置及图形的，皆标注为“宋家湾”，原来这“钟家村”是张冠李戴的。

汉阳城外有个新丰堤，民国时期改名永丰堤。永丰堤以西，皆为水面和稻田，哪里有所谓的“钟家村”？

现今我们所见汉阳琴台，经检索史籍南宋《舆地纪胜》、清初《大清一统志》，皆无记载，仅晚清同治《续辑汉阳县志》有记：“伯牙台，一名琴台，一名碎琴山，在大别山尾，相传钟子期摔琴于此。又县治西五十里，马鞍山集贤村，相传是钟子期故居。”《续辑汉阳县志》系同治七年（1868年）成书刻印。由此可证，今之琴台当建于清代，且所记“摔琴”“故居”是“相传”而已。

刘公洲·鹦鹉洲·夹河

汉阳古城，“江水，在县治东南，环抱郡城。”历代史志古籍如是说。

南宋汉阳知军黄干更有具体的描绘：“惟汉阳地势，其北依山，其南瞰江，东有湖，皆自然之天堑，无湖无江之处十之

二三耳。”然而，也是在南宋末年，汉阳城南，江中有沙洲涌出。沙洲自三里坡直抵南纪门，洲上荻苇繁茂。知军刘谊令民采用，民感之以名刘公洲。

明朝嘉靖年间以来，“刘公洲渐没。但于原洲外，又复淤一洲，下抵汉阳城朝宗门，似于郡城有缠护之情。”刘公洲原来的地方依旧存在，“其洲北为郡城南岸，（两）洲岸相界，中汇江水，冬春水落，四方舟楫聚焉。”此段文字是据《嘉靖汉阳府志》断句解译的。

吾人判断，昔年“洲岸相界，中汇江水”，就是夹河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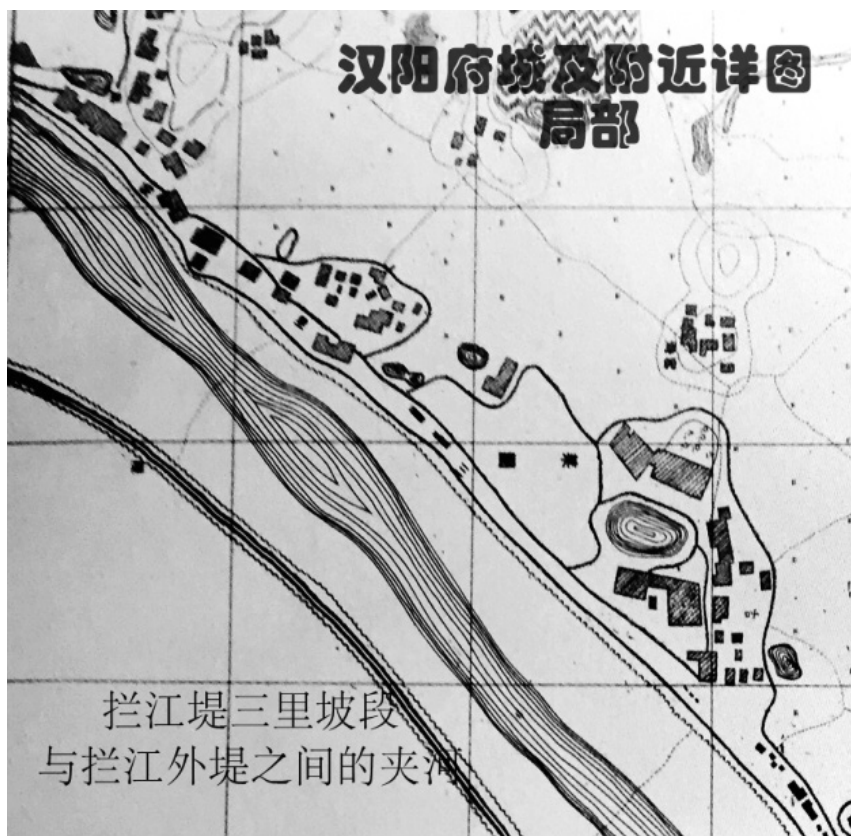
与汉阳城隔江七里，汉晋以前，横亘于江夏山尾黄鹤楼下的鹦鹉洲，是陆游在《入蜀记》中说的“贾船客舫，衔尾不绝者数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的南市。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洲聚于沙，而沙转于水也！”逐渐沉于江中，流逝于茫茫大江。

到民国时期，吾辈所见汉阳城南，已非江水，而是一片平陆。人们认为这是大自然的恩赐，由江南搬迁到江北的礼物，故而把它也命名为鹦鹉洲。被黄祖杀于江洲的祢衡，他的墓和祠也重建于汉阳鹦鹉洲。

湘西南的木排，经洞庭湖流放于此，聚集停泊汉阳鹦鹉洲沿江，形成华中最大的木材市场。

河泊所，是历史上县府管理湖泊和收纳渔税的官署，各河泊所设置官员河泊、攒典各一员。明朝年间，汉阳县设有七个河泊所，管辖近四百余湖泊。靠近汉阳城南正街的河泊所港，应属长江河泊所管辖或河泊所官署所在地。

河泊所港口狭窄，港内水域宽阔，是良好的避风港湾和货运码头。来自洞庭湖及长江沿岸运载棉粮的船只，和经由沌水出



汉阳府城及附近详图（局部）

江的渔船、柴船，多在这里卸货和避风。汉阳城南正街也因河泊所港而繁盛，茶楼、酒肆、货栈鳞次栉比。

解放前，我们从沔东解放区以小舟运送《江汉日报》到武汉，也是从此河泊所港登岸的。沿南正街西行，过南城巷，有一条僻静的小巷，也名河泊所。我们城工组曾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临水而居，作为我们的联络点。

由河泊所港与夹河连成一条拦江堤外的小河，小河右岸也有一条与拦江堤同时延伸的子堤，又名拦江外堤。小河左岸近城处，散居几户人家，利用夹河水域养鹅养鸭，白鹅绿鸭在夹河水面上游戏，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1949年5月17日，汉阳城解放。8月，江水泛滥，淹没了鹦鹉洲，芦寿彰区长带领

我和张忠辉在拦江堤上组织抗洪抢险。我们看到漫过鹦鹉洲的洪水直逼拦江子堤，发现还有两个放牛娃，各骑一头水牛，在夹河里悠哉游哉。我急得大声呼喊，要他们赶快起坡。当他们牵着水牛登上堤岸后，拦江子堤溃决，汹涌、旋转的洪水顷刻淹没了夹河，冲击到拦江堤边。

一道拦江堤，把夹河、拦江子堤、鹦鹉洲、荒五里阻隔于汉阳城外西南。

“文革”时，因河泊所港水变浅、水域宽阔，酷热夏季到来时，周围居住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多在此游泳消暑，所以人们

称它为“万人游泳池”。后来加高了河泊所港堤防，又有人称它为“鹦鹉湖”。

三峡大坝建成后，威胁荆江大堤及武汉的洪水不再。于是，人们逐渐拆除了高高的河泊所大堤，在河泊所港的水域之上，建起了现代住宅小区。现今，拦江堤无处寻觅，往昔郊野上高楼大厦林立，鹦鹉洲长江大桥、地铁四号线都从这里经过。

归元寺·石头山·月湖港

汉阳寺庙，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广的并非归元寺，而是位于龟山南麓、莲花湖畔的太平兴国寺。该寺始建于唐朝，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奉皇帝赵匡义诏令重建。

1947至1949年，我就读于龟山脚下、莲花湖畔的汉阳县立中学，因其校舍原为汉

阳高等小学堂，与兴国寺比邻，曾经目睹兴国寺的断壁颓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吾辈同学聚会，曾培卿、陈国权、李国倜诸同学还能忆及从古庙废墟搬运砖石到学校修缮校舍的往事。

太平兴国寺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代，最后毁于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寺庙香火断绝，僧人逃离，七年无人管理而废弃坍塌。

归元寺，据《续辑汉阳县志·寺观》记载：“在城西二里，顺治初，僧白光，即王章甫，袪葵园建。禅关寂静，戒律精严。咸丰初，发逆（太平天国军）踞汉邑，荡为平地。今仍修葺复旧。”可见，归元寺的香火也并非从始建就一直旺到如今，“禅关寂静，戒律精严”才是始建时的情境。

归元寺北边有座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汉阳城里人都叫它石头山，清末民初的地图上也标称为石头山。因山顶基本是平整的，吾辈读书当学生时，曾在此野营野炊，还向和尚借过碗筷。

清朝道光年间，归元寺始建五百罗汉堂，香火兴旺，吾辈小时候就听到过我们的祖母讲述黄陂王氏父子雕塑五百罗汉的传奇故事。

归元寺的香客主要来自汉口。每当归元寺庙会，信仰佛教的汉口香客都是在武圣庙码头渡河（两岸都叫武圣庙码头）。尤其是农历正月，汉口香客、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来到汉阳。他们渡过汉水，翻过月湖堤，即可乘上小船，一只小船一般可乘载七八个人，有的全家包上一只小船，慢慢地悠然划行，全家老少男女一边欣赏月湖风景，一边吟唱欢笑，其乐无比。船到陡码头，香客上岸，熙熙攘攘，前往归元寺烧香数罗汉。归元寺大水塘的堤上，一排排摊贩为香

客们准备好了烧香所需物品，也可看到大水塘那边小和尚在稻田里劳作的景象。

自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阳与汉口有了天然界线。汉口市井日益繁盛，成为天下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至清末居民已近百万人。然则汉阳各业日渐萧条，虽经张之洞在汉阳创办兵工厂、铁厂，曾热闹一时，但工商业仍然凋敝。经历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抗战胜利，西迁兵工厂（没有回迁），待到武汉解放，武汉市人民政府设立汉阳中心区接管汉阳，下属琴台、大别、鹦鹉、福城四小区，人口总计不足10万，减去福城区的2万多郊区人口，汉阳城区人口仅六七万而已，仅仅相当于现在武汉市一个大的居民小区。我曾作为人民政府干部，因公务坐到了归元寺知客堂的客座上，与归元寺的知客僧交谈，学习了一点佛教的知识，获知了一点归元寺的财产及其他状况……

穿透浓雾向阳开

◇ 李宗祥

(一)

从武汉启程，前往重庆，踏上用初心寻找初心的征程。客机抵达重庆时，恰好是下午。重庆，像刚下过雨，空气湿漉漉的，天空雾蒙蒙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重庆的雾。重庆的雾，土生土长，白白的、浓浓的、茫茫的，不沾染一丝黄色，不是烟雾，不是雾霾。

重庆的雾，非常放纵，非常任性。雾，一层一层的，叠加着，在高楼大厦间飘，在山间飘。似乎整个重庆都隐藏在雾中，在雾中漫无边际地飘。这令人幡然醒悟，为什么人们把重庆称为“雾都”。

走进重庆，穿行在雾中，方知重庆雾气的厚实与坚硬。

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四周环山，临江而筑，依山而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层叠而上，人谓“山城”。人绕山攀登，雾却顺路而下，像铜墙铁壁，堵住去路，压迫人，化解不开，又喘不过气来。难怪在八年抗战时期，日本军机对重庆实施长达五年的狂轰滥炸，却屡屡被满天满地的雾气阻截而失去轰炸目标，让重庆得以规避很多战火与灾难，成为攻克不破的战斗堡垒和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博得“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的美誉，领一时风骚。可见，天地间可敬可叹的物不少，重庆的雾也是。

仰望重庆的雾，虽然望不见早已远去的晨曦，看不到穿透雾层的万道金光，但是一眼瞧得出重庆作为一个新兴的直辖市所承载的梦想。这梦想，如同重庆的雾，来自朝天门奔腾不息的江水，来自棒棒军为人负

重爬坡上坎的吆喝与呐喊，来自解放碑、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铭记的红色血液中流动的历史与悲壮，来自更高、更前卫、更壮丽、更现代的新地标“朝天扬帆”……

倏忽，我总算明白了，这大概是我今日到重庆之后，对重庆的雾和雾中的重庆情有独钟、青眼有加的原因。

（二）

第二天一清早，我睁开眼睛，发现窗外似黑又白。

走出门外，两眼不见眼前有何物，方知雾里看雾又茫然。我如履薄冰，像摸黑走路，从人民公社大礼堂背后爬上一个小山坡，躲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静静地观看重庆。乍眼望去，重庆被雾热情地包围着、拥抱着，非常的安静、平和，像一位智者，在冷峻中思考着未来。其实，重庆被雾强烈地推托着、冲撞着，非常的热闹、喧嚣。因为重庆原本就是一个大都市、一个大闹市，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溢出机遇、财富、生机与活力。故而，在重庆，获得的力量、成就和殊荣，像雾里看花，分外使人在云谲波诡中上下求索，永无止境。

约莫过了一刻钟，天气稍稍转好，天空有了光亮的颜色。在这里，没有日月的轮换，没有朝霞，没有晨曦，一切都很美好、很优雅、很超然。一种不深沉却很清纯的感觉，怦然抚慰人的眼目，转而使人难以置信。在这冬日，阳光会出现在重庆的上空，更使人疑窦丛生。即便有了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天是蓝的，地是绿的。疑似这种归化而来的清静的境界，消融了淡而无味的光景，得以创造神话与传奇，重庆才大踏步向前，点点灯火瞬间被水光天色替代。

突然，眼前像出现了海市蜃楼，上空是浅白色带状云雾，一圈一圈地罩住重庆城区，下面则是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群，像从云海里飘移过来，高楼大厦依稀可见，蔚为壮观，别有风味。

这一次，我被重庆的云雾纠缠，竟然忘了湖广填四川、抗战江浙沪内迁、三线建设等发生在重庆的大规模移民事件，却牵强附会，把重庆与海市蜃楼粘贴在一起，想当然地认定重庆是一座从雾中飘来的移民城市。而且，这种感知，在我冲破层层云雾、走下小山坡、到达重庆人民广场、看到中国三峡博物馆时，颇有些洋洋得意，以为从中找到了佐证。

中国三峡博物馆耸立在一层薄雾中。忽然，一阵风悄悄地吹过，雾层动荡了一下，眼前即刻一亮，仿佛一道金光闪过，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它要紧不慢地从一座山中舒展平缓而出，向人们昭示着在三峡工程建设时期，不断有新移民涌入这座城市，与这座城市的命脉相通，休戚与共。

霎时，我触电一般惊醒，由此想到武汉。1938年，武汉大会战，使武汉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抗战指挥中心、抗战文化中心、二次国共合作政治舞台中心。武汉陷落后，抗战重心发生转移，苏、美、英、法等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事机构40多个，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使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心”；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学者、教授都荟萃重庆，较为完整地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国地位”……正是这场大

迁徙、大转移，新思潮方兴未艾，重庆才活生生地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有了不同寻常的记忆，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才在短期内快速地得到提升，并完成一次成功转型。

这一刻，如同浓雾蒙蔽人的眼睛，总有一些不该消失的事情被忽略、被遗忘，而这些事情默默地存在，暗暗地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给我们一些警示，使我们明了事理。于是，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争抢着改造我心目中的这座城市，使我再次打量眼前的这座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雾非但没有丝毫消散的迹象，反而有了重新聚拢的冲动。经过三番五次拍拖、纠缠，雾终于簇拥在一起，欢聚一堂。像被这短暂的欢聚感动得流下热泪，雾中开始飘荡起雨。雨，一丝一丝的，比牛毛还轻，比花针还细，慢慢地粘贴在我的脸颊，沾附在这座城市的肉体上。不论是人还是城，一时想摆脱这样的细雨，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一时想摆脱重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在重庆，被浓浓雾气笼罩，在心灵深处却没有滋生出“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一丝惆怅、一阵迷茫，即便此时此刻因有泪水充溢而双眼变得迷蒙。或许，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世界上许多东西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不证明不存在，许多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暖人心。

（三）

在重庆行走，有悖常理。通常走着走着，有可能正从一栋楼中穿过，也有可能正走在一栋楼的楼顶上。雾来时，犹如坐上了过山车，或钻入地下，或飞上天空，不知路通向何方。没过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被潜移默化，同世代代在重庆安居乐业的

市民一样，习惯于与雾和平相处，同呼吸、共命运，爬坡上坎，走在九曲十八拐、永远没有尽头的路上。

由于重庆雾气重、湿气重、持续时间长，空气中始终流动着一种纯正的冷、接连循环着一种清澈的冷。自然呼吸时，雾气大片大片的经喉、入肺、进脑，凉飕飕的、冷冰冰的，叫人切实感受到这种雾气的余威尚存几分，倒逼人精神亢奋。同人摆龙门阵，哼唱川江号子，大口吃火辣辣的重庆火锅，大口吃麻辣辣的渝菜，抵挡风寒，驱除风湿，暖和身子，滋养身心。

果然，像这样深入重庆的市民生活当中，才能真正感受到传说中麻、辣、烫的滋味，体会到重庆温暖、可亲、有人情味，窥探到三千年巴渝文化的底蕴。由此推测，一旦失去了雾，重庆就失去了一种风景与文化，失去了一种情感与寄托。由此及彼，新重庆城市形象也随之呼之欲出，与城市文化融为一体，更接天气，更接地气，更接人气，无需在报刊电台登广告，在楼顶山巅树招牌，博取眼球，就能被人随意地找到感觉，入脑，入心，引领人心走向。

就像一个旅游圣地，不是关心游客会不会来游玩，而是关心游客是不是再次来游玩，是不是带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同乡来游玩。因而，重庆变了，变得更加注重自身特色，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历史。

保护自己的历史，就是珍惜今天，保护自己的明天。这反而带来意外的惊喜，让重庆轻松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把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促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阔步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因而，类似于素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在城市的发展转型期与阵痛期，雾中的重庆也布满了种种变

化莫测的触觉，或狂野、或敦厚、或柔软、或温顺、或耀眼、或悲壮……

或许独在异乡为异客，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依然茫然一片，不能独享这种摄人心魄的场景。瞬间，一些人、物、景快速地掠过，一律模糊如雾，甚至于很多可以忽略不计，也不免陷入虚无主义的汪洋大海中。

幸好这时路过特园。

在重庆，在雾中，稍不留神，就可以忽略很多东西，可以遗忘很多东西，然而，特园是很难被人轻易地忽略的、遗忘的。

虽然雾锁愁城城似迷，天色越发显得很暗淡、很晦涩、很无奈，但特园里面灯火通明、别有洞天。就像家，总吸引我们的目光，提振我们的精神。步入其中，旋即发现我在重庆这么多天，只有这一次才真正踏上一条坦途。如同拨云见日，走出层层雾霭，浴火重生，一切历历在目、鲜活如初，有阳光般的笑容，有天使般的面孔，有神仙般的美丽。蓦然，宛若前方升起一盏明亮的路灯，指引着我走出沉黑的夜幕，我不禁心潮澎湃，从心底怦然升起无限的敬意和仰慕之情，举手向“风雨同舟共商国是”大型纪念浮雕行礼致敬。

特园，也叫鲜宅，是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因鲜英字“特生”而得名。抗战时期，特园是重庆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开展民主运动的大本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也是特园的常客，特园因此也被称为“民主之家”。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顾特园”，与张澜、沈钧儒、鲜英等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特园也因此被誉为“光明之家”。可惜，时过境迁，此特园已非彼特园。过去的特园在时代的演义中已化为灰烬，现在的特园则是在原遗址上兴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民革、

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分别被布置在不同的楼层陈列展览，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也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示。

一帧帧写满历史与回忆的照片，一幅幅记载协商与合作的画面，一件件追求民主与解放的事件，带着我穿过历史的尘埃、雾霾和云霭，站在团结与民主的大旗下深思。为什么这么多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国家栋梁集中在重庆，在蒋介石的身边参政议政，却被远隔千山万水的毛泽东吸引过去，团结起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赴国难，共同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此次重庆红色之旅让我有了更深的感悟，重温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合作初心，勇于承担起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大道同心，薪火永传。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谋划在全国举办主题巡展，不久将到武汉，与武汉这座红色的革命城市相连，把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立、形成、发展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图文并茂地呈现在武汉人民的面前……

（四）

武汉与重庆，这两座城市都是可亲可敬的，红色革命给这两座城市留下了诸多深刻的烙印和不朽的遗迹。不过，重庆是中国众多民主党派的发源地和集中地，活跃的政党政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另一种红色记忆。近些年来，这种独特的红色记忆被挖掘出来，修建了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民联（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四个民主党派成立纪念碑,周公馆、桂园、宋庆龄旧居、冯玉祥旧居等众多遗址也通过挖掘、修缮和保护,重见天日,再现历史,重新铸就这座城市闪光与永恒的一页。

虔诚地站立在这些遗址或遗迹前面,宛如读一本本好书,听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迎来一个个好日子。尤其是这天傍晚,在重庆人民公园拜谒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尽管天色阴暗、寒风瑟瑟、冷雨潇潇、落叶纷飞,但是,我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重温历史,感悟同心同行,仿佛听到了一个热血沸腾的大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对我们振臂摇旗,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时空流转中,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情感的牵系、一种智慧的联运。虽说这情感、这智慧一时半会儿难以用言辞表达,但无疑又一次使人从中获得了勇气和胆略,重温“五四”精神,重温“爱国”的誓言和“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的愿景,就能够从这里出发,向前奋进,走更远的路,爬更高的山,看更美的风景,明辨更深的事理。

刹那间,一切悄无声息。

时间一晃而过,天黑了,风息了,雨停了。很快,被风吹开的雾,被雨捎走的雾,在万家灯火的簇拥下,又重新聚拢,四处弥漫,攻城掠地。重庆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即刻从时空中遁去,渺无痕迹了。

或许,这是重庆最美、最耀眼、最动人的时刻,令人心生暖意和另一种不被别人所拥有的美好的想象,让人得到的岂止是光明一现那么简单?

就在这一天,与重庆作别,返回武汉。这天这雾这城总算给我们一点面子,送给我们一件别开生面的礼物。

这是崭新的一天。天刚泛白,天空就

有了放晴的迹象。不过,眼前总像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似窗纱遮目,不能极目远眺重庆全景。不想在路过重庆红岩魂广场时,天眼洞开,光芒四射,整个广场在前方展露得一览无余。特别是那十八根花岗岩纪念柱,柱顶红梅怒放。这是一种坚韧、不屈和向往。穿透浓雾,“牢破梅开”,整个世界恍若光明如镜、温暖如春。而红岩革命纪念馆台阶前的红梅与此遥相呼应,全部盛开,一片通红。纪念馆在红色花海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一曲《红梅赞》从纪念馆中飘出。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上,红梅开。对一朵红梅而言,开花就是她奋斗一生的目标,是她的一切。先是一朵红花,一片红花,然后是一整片红花。这一整片红花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背景,包括我们,包括后来的人,都在这一背景下茁壮成长,依次成为这一整片红花,甚至比这一整片红花还要庞大的花海的护卫者和守护神。这是不是生命中呈现出的最平凡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抑或,在人生旅途中,有信仰的人、有追求的人,重新创造的一个奇迹呢?

这个奇迹,只有在城市的深处才能探知。不到重庆走一走、看一看,你是不完全了解这个奇迹的。

(李宗祥:湖北省、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武汉市江夏区工委主委,江夏区园林和林业局局长)